



2009 年 6 月 13 日第 15 期

总第二十五期

2008 年 9 月 13 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比较研究

[王 怡](#)（德国） 试论德国第三帝国时期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诗歌

书评与序跋

[何 蜀](#) 一代青年精英的文革思想史——读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口述历史

[我怎样成了逍遥派](#)——虞友谦研究员访谈（节录）

史林一页

[陈益南](#) 1969 年毛泽东何时到湖南视察？

蓦然回首

[胡显中](#) 鞋底风波

[陈仁德](#) 独特的挂牌

文摘

[陈冀德](#) 姚文元曾做过我的指导老师

闲读偶记

[渔歌子](#) 值得注意的文革文物造假

小资料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比较研究】

试论德国第三帝国时期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诗歌

王 怡（德国）

引论

本文尝试分析、比较德国第三帝国时期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这些创作既包括作为专制政府宣传工具的主流诗歌，又包括与主流创作相疏离对立，甚至以隐秘方式产生并以各种特殊形式流通的地下诗歌。虽然德国第三帝国时期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性质、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同样是在政治强势干预下创作的“非常态”诗歌创作却具有可比性。本文从这种异同入手，通过对诗歌作品的分析来阐释政治掌控文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反思政治、语言、社会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本文采取社会历史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把这两个时期的诗歌作为特殊的文本，又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第一章 历史背景

第三帝国时期文化政策及文学创作概况

从 1933 年希特勒攫权至 1945 年二战结束的十三年间，是德国历史上最为残暴黑暗的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政府对外侵略扩张，对内推行“一体化”，进行专制极权统治。希特勒直言纳粹政府控制的文化是对“公众生活政治解毒”，并对文化界进行“大扫荡”（Säuberung。高中甫，宁瑛《20 世纪德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 1998 年版 86 页）。“一体化”要求文学日耳曼化；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被视为堕落、反动的思想从文学作品中清除。纳粹政府通过焚书运动，定期公布禁书“黑名单”，建立相关的机构等措施，从作家、出版商、图书馆员等不同环节下手，严格控制文学作品的创作、流通。以戈培尔为首的宣传部

建立帝国文化协会，全面控制文化事业，使其为法西斯政府服务：“把各个文化领域的认识统一到帝国的领导下，赋予他们统一的方向”（高中甫，宁瑛《20世纪德国文学史》89页）。帝国德语文学推进中心负责促进纳粹所需的宣传性文学作品的创作，国社党监察委员会主管对纳粹党的哲学和政治及学术出版物和教科书的审查。

在这样的文化政策下出现了一批“以数量庞大的创作宣布自己的出现”（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孟军译，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85页）的纳粹“新诗人”。其诗作的主要形式包括向民众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的鼓动诗和示威式的进行曲。这些作品大都大量出版，甚至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包括豪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在内的一批诗人被帝国宣传机器精心制造成纳粹神话，成为大众偶像。与此同时却仍然存在抵抗诗歌作品，如在地下刊物秘密发表的作品和集中营监狱内作为抵抗手段而产生的文学作品等。除此之外还有一批留在德国国内，能够继续写作发表却不完全认同纳粹统治的“内心流亡派”作家，其作品性质及文学价值从二战结束后至今一直都备受争议。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政策及文学创作概况

文革期间原有的文艺组织机构被彻底冲垮，绝大多数作家被剥夺写作权利，受到残酷迫害。主流政治话语全面覆盖了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文学创作走向极端政治化，并被异化为以“三突出”为指导思想，以“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主题先行”为创作方式和创作原则的政治斗争工具。通过“三突出”的提出、补充和提炼，一整套官方文革文学创作规范被全面确立起来。在其约束下，任何表达私人生命体验的个性化写作都会被当作“资产阶级文学创作”受到讨伐和放逐。文革时期将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规范体现到极致的便是盛极一时的集体写作形式“写作组”，它们占据全国重要媒体的版面，成为传达中共中央路线斗争最新动向的舆论策源地。

文革时期发表在红卫兵小报和国家出版物上的诗作（文革后期每年大约出版100部诗集。参见王尧《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与研究》，载《文艺理论研究》

1999年第5期58页)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诗歌。这类诗歌严格遵循文革文学创作规范,充斥着空洞的政治说教和虚假的浪漫抒情,主要包括颂歌和战歌两大主题。与此相对的是与文革写作规范不同程度疏离对立,以隐秘方式创作的潜在诗歌创作。这种在特殊环境中秘密写作传播的地下诗歌主要有两大创作群体:一个是曾经活跃于文坛,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失去话语权的老作家群体;另一个是文革时期新生的青年诗人群体,主要由上山下乡的知青组成。潜在诗歌因其传播影响范围的局限无法构成对主流诗歌的冲击,但其体现的独立反抗精神和独特的美学趋向以及对诗歌发展的影响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较高的价值。

第二章 主流诗歌

这在德国主要指受到帝国宣传机器扶植推崇,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的诗作,在中国包括按照文革创作规范进行创作,发表在红卫兵小报及国家刊物上的诗歌。两国的这种主流诗歌都在极权统治的特殊历史社会条件下产生发展,无论在产生源头,创作主体,创作空间,以及创作与政治的关系等创作背景条件,还是体现在作品当中的主题,写作手法,语言特点等诸多方面都有一系列的共通之处。本章从这些相似之处出发,结合由于两国政治意识形态差别造成的一系列的区别,尝试分析政治掌控下的主流诗歌创作。

第一节 历史源头

分析文革时期和第三帝国时期诗歌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所体现的思想意识,审美取向及基本创作方法,在此前的文学创作中业已存在,只不过未能引领大局。第三帝国和文革时期的文化政策正是植根于此,利用文学创作中符合或者接近当权者思想意识形态的元素,把其中的消极甚至反动成分发展到极致。进而以此为基础建立官方写作规范,通过国家机器打击与其疏离对立的文学创作,扶持打造并全面控制传播意识形态话语的主流文学,使文学创作高度政治化。

第三帝国时期由纳粹政府作为“真正德国文献”扶植宣扬的一类文学作品早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甚至小成气候。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包括科本霍依埃尔(Kolbenheyer),布鲁克(Blunck),弗伦森(Frenssen)在内的一批反动作家的作品就已经大量流通。沙文主义、泛日尔曼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等具有

反动倾向的思想意识形态在纳粹文学的直接源头，二三十年代德国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文学，“血与土”文学（Blut- und Bodenliteratur）及“北欧复兴”（die nordische Renaissance）文学（同上：S.77）中就有体现。

文革文学的直接源头是当代文学史中所称的“十七年文学”（王尧《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与研究》60页），正是这个时期文学创作中某些因素的恶性发展，最终产生了文革文学。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通过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对文学的全面领导，奠定了动用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一切力量对文学提出形形色色政治要求，进行有力掌控的基础。建国后从50年代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到60年代在“反对修正主义”口号下的一系列批判运动，中国文学界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完全取代了正常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文革文学虽然在口号上反对十七年文学，然而完全不否定这些批判运动，反而将其‘革命精神’发挥到极致。”（董健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12页）除了绝对隶属政治之外，文革诗歌在选材、语言、形式等方面都与十七年文学一脉相承。文革时期颂扬个人崇拜、政策、时事、文件的诗作是早在建国初期就出现的颂歌风潮发展到极端的产物；阶级斗争主题的泛滥则可以追溯到配合“反帝反修”运动的诗歌作品。文革诗歌大量运用排比，极尽奢华的创作手法是十七年诗歌铺陈罗列的通病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产物；语言运用极度夸张甚至虚假的现象是“大跃进”诗歌的恶劣升级；语言风格的亢奋粗鄙则是“反右派运动”，“诗歌大众化”，“新民歌运动”的畸形发展。

第二节 创作主体

控制作家，是政治介入并掌控文学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第三帝国和文革时期的文化政策中，控制作家都占有重要地位。镇压、迫害、清洗进步作家，通过一系列高压政策以至动用国家机器剥夺其话语权，同时扶植培养隶属于专制统治体系，忠实完成当局指派任务的御用文人是专制政治控制作家的基本形式。

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政府残酷迫害异己作家的同时，通过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下属的帝国作家协会全面控制作家话语权：只有这个协会的成员才能从事创作，加入此协会必须出示“亚利安鉴定”，书面保证对国家的忠诚，承认国家有“审

查和照管的权利”。一批希特勒上台前就具有反动倾向的作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支持，成为纳粹控制的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的成员，构成了纳粹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成了第三帝国文学的主体。名噪一时的迪特里希·艾卡特（Dietrich Eckart）及被帝国宣传机器精心制造成纳粹神话的豪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都属于这一类纳粹诗人。除此之外，希特勒政府还培养了一批在权力系统中有一官半职的年轻政治诗人，完全作为输出教义的宣传工具，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汉斯·保曼（Hans Baumann），海因里希·阿纳克（Heinrich Anacker）和格哈德·舒曼（Gerhard Schuhmann）等。

文革中大批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被强行剥夺了话语权：文革头五年包括大批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大都被流放，被迫接受劳动改造，许多著名文艺家被迫害致死，全国几乎所有文艺刊物被停刊。1971年以后部分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写作的权利，但只能严格按照文革创作规范扮演政治工具的角色。

与第三帝国时期相比，文革时期主流诗歌的创作主体还有一些独特之处。首先，两个时期诗歌作者所属的阶层和教育水平有明显区别。文革中民间大众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达到空前一致，二者同构并取代了知识分子话语，这决定民间大众话语的主体即是主流显在诗歌创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工农兵业余作者，“他们有的开始只有小学低年级的文化水平，有的还是半文盲”（任棣《走出“彼得堡”》，转引自王尧《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载《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95页）；还未完成中学学业的红卫兵作者；以及部分将认识写作水平主流化，以民间大众话语写作的知识分子。而第三帝国时期从事诗歌创作的作者大都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或者通过教育成为了中产阶级。这种差异是由在两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形态的不同造成的。其次，在诗歌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写作组”是文革时期特有的现象。它是“按照官方意识形态标准和文革文学创作规范进行操作的集体写作形式，具有相当的严密性及组织性”（董健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277—280页），居于掌控社会舆论的绝对权威地位。写作组是政府控制文学创作，政治操纵舆论发展到极端的畸变产物，隶属于写作组的作者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及专业观念可言，只是服从于政治目的的写作机器。

第三节 作品主题

第三帝国和文化大革命在运动性质、指导思想、意识形态、文化历史背景等诸多方面的本质区别无需赘述。这些差别决定了这两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各具特点，然而有一些特定的主题却在两个时期都被主流诗歌反复咏诵，而且诗歌作者对这些主题的基本处理手法也有一系列的相似之处。

对领袖的顶礼膜拜

对政治领袖的神化和极端个人崇拜是第三帝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与之对应，两个时期的文化机构都大力推崇这类渲染对政治领袖个人崇拜的诗作，将其作为煽动民众、控制舆论的重要手段。此类诗歌在两个时期的主流诗歌中都占有很大比重。

在第三帝国和文革时期的诗歌中，政治领袖最基本的形象是拯救者和解放者——他们或是业已拯救民众而铸成了丰功伟绩，或是将解放全民族，带领其走出深重的苦难。作为民族“救星”的政治领袖被狂热地反复咏赞。著名纳粹诗人格哈德·舒曼（Gerhart Schumann）用简单的诗句提纲挈领地写出了这类诗歌的基本思维模式：“只有希特勒会拯救我们！/只有希特勒能解放我们！”在中国，毛泽东则往往与“红太阳”这一核心象征符号相联系，因其独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功绩而被顶礼膜拜。这类诗作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广为传唱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政治偶像与崇拜者之间的关系在诗作中体现得较为多样化，主要为包括父母与子女，宗教偶像与信徒，上级与下属关系在内的复杂综合体。“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领袖，我们紧握他的手。/……我们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至死不渝……”中体现的讴歌者和政治领袖的关系既包括上级与下属的成分，又含有宗教崇拜色彩。“我在毛主席身边战斗，/享受着人生最大的幸福，/像婴儿在母亲的怀抱，/像幼苗沐浴着阳光雨露。”（马无疆《我站在毛主席身边战斗》，载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第12期，1966年9月10日）中体现的则是父母与儿女和上下级关系的综合体。

与第三帝国时期纳粹诗人相比，文革诗人对毛泽东的狂热个人崇拜更加极端，他们歌颂的对象不仅包括毛泽东本人，他的头像、图片、作品集“红宝书”，

甚至住过的房屋，用过的生活物品都成为诗歌里被热情赞颂的对象。

鼓动战斗

第三帝国及文革时期通过国家机器钳控文学的直接目的是使文学完全为政治服务，使其沦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最直接体现这一目的就是大量的鼓动诗。这些诗作回避现实问题，堆砌情感宣泄式的诗句美化战斗场面，煽动人们投身到政治斗争中去。

迪特里希·艾卡特（Dietrich Eckart）的《德意志醒来吧！》（Deutschland erwache）便是一首典型的此类诗歌：

德国，快觉醒！/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钟楼之间回荡着钟声，/敲吧！直到火星飞进。/犹太要来把帝国占领。/敲吧！直到钟身发红。/环顾四周，统统是火光、酷刑和杀戮。/暴风般的钟声回荡不停，头顶炸响复仇和拯救的雷霆，/大地起伏不定！/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

（转引自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87页）

文革中的鼓动性诗歌主要是鼓动红卫兵投入到造反斗争或者假想的阶级斗争中去。虽然鼓动内容完全不同，但其性质实际无异：都是划出一部分人为异己，制造敌人和斗争对象。同时基本手法是相似的，即以狂热情感，甚至蛮横的语调取代理性分析：“革命夺权起风暴！/左派联合势冲霄，/人民军队作后盾，/战鼓如雷鬼神嚎。/……”（尹业新《夺权赞》，载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第11期，1967年2月10日）风暴的具体原因，战斗的目的一概略过，被渲染的只有盲目的战斗激情。“革命岂能有罪，/造反就是有理。/愿将满腔热和血，/换来神州春色。/……红心献给毛主席，/誓死造反到底。”（陈龙康《西江月·铁窗烈火》，载首都红代会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第27期，1967年5月9日）这里通过反问式的强盗逻辑来解释斗争的理由，并自居“救世主”毛泽东手下的“救世者”，讨伐假想“妖魔”，一派泛滥的圣战激情。

胜利幻想

鼓吹战斗胜利是第三帝国和文革期间煽动战斗激情的重要手段，用英雄主义手法渲染胜利幻想由此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

“……伟大的胜利就在我们面前！/即使一切都分崩离析，/我们仍将迈步向

前！/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我们将把世界独占！……”（转引自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101页）在这首令纳粹运动领袖汉斯·保曼名声大噪的歌词中，占领世界的胜利幻想被反复高调咏唱。而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完全局限于中国境内的政治运动中，居然也出现了一批表现“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主题，幻想占领全世界的荒唐诗作。长达200多行的战争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便虚构了中国战士在俄罗斯、意大利、也门、金边……进行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战斗的场面，充斥着自命不凡的救世使命感。

血腥、暴力、死亡

战争、战斗中不可避免的暴力甚至死亡也成为第三帝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诗歌的表现对象。对敌人的血腥暴力场面被用杀气腾腾、粗俗野蛮的语言展示，战斗者的自我意识及其体现的反动思想膨胀到达极点。

反犹思想是第三帝国时期的主要反动思想之一。纳粹诗人在表现对犹太人的血腥暴力时写下这样一首诗作：“在井栏上把长刀磨利，/用长刀刺进犹太人的身体，/血要淌得又稠又急。/……血必须涌流……/犹太会堂里吊起一头黑猪。/把手榴弹塞进议会大楼！/血必须涌流……/把婊子从御床上拖起来，/用犹太胖子给断头台上油，/血必须涌流。”（引自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86页）文革时期发表在红卫兵小报上的一首表现政治运动中暴力斗争的诗作就残酷程度而言毫不逊色：“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作者不详，引自岩佐昌璋、刘福春编选《红卫兵诗选》，日本福冈中国书店2001年版255页）

而在表现我方“战士”经历的暴力血腥场面时，则用英雄化的手法进行描写。“天塌下来地接到，/砍下脑壳碗大疤，/碧血洒在赤旗上，/人间开遍革命花。”（作者不详，引自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选《写在火红的战旗上》，北京，1968年12月，46页）在这首红卫兵诗歌中迸溅的鲜血化成了欢庆“圣战”胜利的鲜花。这种用鲜血渲染崇高责任感、使命感的表现手法也在第三帝国时期广为运用：“我们决不放手旗帜，/即使有人受伤倒下。/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资源和财富；/而我们要付出的更多——火热的鲜血。/到生命最后的关头也

要坚守职责，/我们决不放手旗帜！”更多的时候，血在纳粹诗歌中被作为抽象符号使用，出现在著名的“铁血”之中，代表战争勇气，脱离了与肉体的直接关系。无论是在文革，还是在第三帝国期间，诗歌作者都致力于营构一种独特的死亡美学。死亡往往被作为一种美好的境界宣扬，其残酷性则被淡化忽略：“……黎明之前身死去，/脸不变色心不跳。/满天朝霞照着我，/胸中万杆红旗飘。……”（范培瑾《胸中万杆红旗飘》，载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兵团总部《八·三一战报》第34期，1967年6月24日）在这首惨死在武斗中的十四岁红卫兵的绝命诗中，死亡平静而高尚，被英雄主义加工为实现崇高革命理想的途径，与荣誉感紧密联系的使命。相同手法在纳粹诗歌中也有大量例子，一首诗歌描写新上战场的士兵看到德国士兵尸体时的感受：“……我们也将这样死去，正如他们一样，/十八岁就成为英雄。/这叫做：我们前线的庆典！”

奉献生命和亲情

英雄化手法也是第三帝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诗歌作品表现家庭情感的主要手段。战斗及为战斗牺牲的狂热被置于骨肉亲情之上，与这种神圣的情感相比，亲情被定位为应当被战胜的落后情感。这种诗作多采用家庭成员对话形式，通过家庭成员间思想“进步程度”的对比煽动英雄主义激情，由此鼓动读者抛弃家庭情感的牵绊，带着为圣战献身的崇高使命感走上战场。

一个纳粹士兵这样写给他的母亲：“……看，我们自豪的前进，毫不迟疑/走上战场，英勇还击。/一旦战斗结束的号角响起，/人们会说起德国的青年，/我们像神话里的英雄，/紧随伟大领袖的旗帜，/德国在我们身上体现，/德国，深深埋藏在心里。/如果我倒下，妈妈，你要承受这个消息，/你的自豪会战胜伤痛，/你有幸献给它一个祭奠品，/它，我们所说的德国。”

与这种安慰式的语调相比，文革红卫兵诗歌中的此类诗歌更加慷慨激昂，天真盲目的政治狂热泛滥：“放开我，妈妈！/别为孩子担惊受怕。/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再见了，妈妈！/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命令我立即出发！/……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妈妈！/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儿愿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引自金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84页）

第四节 语言特征

高度政治化

无论是第三帝国时期还是文革时期，高度政治化是主流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诗歌被异化成宣传政治思想的工具，其传播空间是街道、厂矿、军营等公共空间，运用的语言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公共话语，因而抒发个体情感的功能遭到废置，政论性取代抒情性，“个人化”语式被“社论”语式所替代。

这种特点集中体现在“我们”体诗歌的盛行上。第一人称单数的“我”转变为复数的“我们”，阶级或者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取代个人，成为诗歌的主体。正是“社论”语式控制取代“个人化”诗歌语式，政党、国家、民族共同体对个体生命空间全面占领的表现。“我们像以往一样对这个召唤着迷…/因为我们的拳头紧握旗帜！/因为我们紧握它它也维系我们并迎风招展。/这样我们敢于奔赴任何险境。/……”在纳粹代表诗人格哈德·舒曼这首共十一行的诗作中就九次出现“我们”，是“我们”体诗歌的典型范例。“我们”体在中国产生于二十年代末的无产阶级诗歌，发展壮大于解放区诗歌，其核心地位在建国后十七年得以奠定，到文革时期更是发展到极端，许多诗歌彻底放弃了个体私语式的抒情语态，不过是分行的社论：“中国登上联合国讲台，/七亿个喉咙大声在说：/我们坚决支持——/第三世界的反霸斗争；/我们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掠夺。/……我们要对世界革命多作贡献，/我们要同中小国家密切合作。/……”（周时永编《中国登上联合国讲台——为我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放歌》，引自《时代的洪流——颂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41页）

套语式写作

第三帝国和文革时期高度一体化的文化政策及诗歌政治化的最直接后果便是创作完全丧失独创性，诗歌沦为千篇一律的陈词，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套语式机械写作是这两个时期主流诗歌作品的又一大共同特征。

套语式写作首先体现在创作主题的雷同，这一点在上一节已有过详述；其次，作为诗歌基本元素的意象在纳粹诗歌和文革诗歌中也有一系列相似之处。例如纳粹诗歌中战鼓与旗帜是描写战斗场面时必然出现的意象：“仔细听，战友，战鼓响起，/旗帜招展在风中。/仔细听，战友，战鼓响起，/每个人该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文革诗歌中这一意象的运用也很类似：“毛主席，巨手挥/长江两岸响春

雷/东风吹，战鼓擂/红旗漫卷武汉关/处处成立革委会。”（黄声笑《长江万里一片红——热烈欢呼革委会成立》，引自王尧《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载《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90页）相似的套语还包括抛洒热血赢得胜利，拯救民族国家于危亡以及从领袖诗作或讲演中截取的片段等。这两个时期的主流诗歌作品往往言之无物，仅仅是根据政治需求机械排列组合这类套语的产物，毫无艺术独创性可言。

文革时期的诗歌还严格遵循二元对立的思想，对自然景物，时空概念，人物动物，色彩，甚至衣着装束进行政治分类，将其加工为强烈对峙的正反对比意象，建立了一整套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象征符号体系。

亢奋粗鄙

在第三帝国和文革时期的主流诗作中，“凯歌高奏”式的光明腔调都占绝对主导地位。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缺陷不符合文学创作指导思想——英雄主义的要求，在两国都是诗歌创作的禁区。大量诗作抒发空洞的豪情壮志，铺排的排比句式被广为运用。纳粹分子血腥野蛮统治以犹太人为首的其他民族，甚至推行屠杀等野蛮暴行；文革时期对“走资派”等“专政对象”的殴打、折磨也非常普遍，这种社会生活的野蛮化给当时的精神文化、语言文字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诗歌语言粗鄙化是当时野蛮的非常态生活影响的一个重要层面。

诗歌残暴语言的密集显示了人性的缺失退化：“油炸勃烈日涅夫，/绞死科西金、米高扬！”（红芒《打倒苏修》，载北京外语学院红旗战斗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报》第12、13期，1967年2月8日）“打！打！打！打！打！/狠狠的打！/刘少奇不投降我们就要打！/……”（“拉下马”战斗组《把刘少奇拉下马》，载上海市小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小教司《小教造反报》第8期，1967年4月24日）相比之下纳粹诗歌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井栏上把长刀磨利，/用长刀刺进犹太人的身体，/血要淌得又稠又急。/……”（转引自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86页）

脏话粗话登堂入诗，也是此类诗歌独特的语言景致：“顺着街灯柱把霍亨佐

伦分子吊起来！/让狗儿们晃荡吧，/……犹太会堂里吊起一头黑猪。/……把婊子从御床上拖起来，/用犹太胖子给断头台上油。血必须涌流。”（同上）这种用“婊子”、“蠢猪”乃至“王八”、“混蛋”漫骂敌人的手法在红卫兵诗歌里面也有大量例证：“王八柯西金，/混蛋勃列日涅夫，/……技穷似黔驴，/无能赛蠢猪。”（驱虎豹《砸烂苏修狗头》，载北京铁道学院红色公社《铁道红旗》第3期，1967年2月15日）

第三章 非主流诗歌

在主流诗歌绝对占据第三帝国和文革诗坛的同时，在这两个时期都存在一批表现思想，艺术风格都明显区别于主流诗歌的作品。与主流诗歌相比，这些诗歌无论在创作主体，创作空间，表现主题，作品传播方式，产生影响等方面都呈现多元化，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些作家作品甚至素来颇有争议。

第一节 创作主体

第三帝国时期在德国国内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非主流作家成份非常复杂。他们对待希特勒政府的态度也很复杂。按照对待极权政府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态度，这些作家可以粗略地分为抵抗派作家和其他非法西斯作家。

一批希特勒政府上台之前就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和革命艺术家协会等民主进步作家团体的作家“秘密地留在德国，以语言文字为武器，或用巧妙伪装的策略向法西斯主义进攻”（引自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162页），成为抵抗派作家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既包括来自共产党、社民党的作家，又包括部分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甚至还有一些宗教界作者和纳粹党内部的觉悟者。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被纳粹扼杀以后以“红色教堂”为代表的一批地下文学组织仍然继续从事抵抗活动。除地下反法西斯文学以外，抵抗文学还存在另一种形式，即在纳粹集中营和监狱中作为抵抗手段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具代表性的诗人包括阿德勒（H. G. Adler），霍夫曼（Camill Hoffmann），阿皮兹（Bruno Apitz）等。曾为纳粹党支持者后转而反对希特勒的豪斯霍费尔（Albrecht Haushofer）被杀之前在狱中创作的《莫阿比特十四行诗》也可以看作是这类产生于监狱集中营的反法西斯抵抗诗歌。

内心流亡（Innere Emigration）是德语文学界向来颇有争议的一个概念。从其产生、定义到所属作家的界定都多有争论。为了论述清晰，本文将区别于纳粹御用文人，又不属于抵抗派作家的其他作家都归为非法西斯作家。这些作家创作风格、主题迥异，与当局关系不同，个人命运也因此千差万别。一些作家始终不向纳粹屈服，保持了个人的尊严与自由，女诗人胡赫（Ricarda Huch）是其代表：她毅然退出纳粹化的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第三帝国期间，尤其是在战争最后两年，她写下了多首表达对纳粹憎恨和对反法西斯斗士赞颂的诗歌，如《致无名的死者》、《我的心，我的狮子》等。这些诗作直到 1944 年才得以收入诗集《秋火》出版。另一类作家则转向田园牧歌、历史传奇等中性主题，用影射等隐晦手法进行消极抵抗。代表人物包括自然派诗人洛尔科（Oskar Loerke），雷曼（Wilhelm Lehmann）；倾向历史题材的作家如伯根格伦（Werner Bergengruen），施奈德（Reinhold Schneider）以及带有宗教色彩的诗人施罗德（Rudolf Alexander Schröder），伯恩霍夫（Dietrich Bonhoeffer）等。还有另外一些作家如荣格尔（Ernst Jünger），贝恩（Gottfried Benn）因为其某些作品中的亲纳粹嫌疑而一再成为争论的焦点。

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文坛遭到清洗，大批作家被批斗、迫害，关进牛棚、监狱或者流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然而同第三帝国时期一样，很多被剥夺话语权的老诗人坚持与主流创作规范相疏离对立的创作，其作品成为文革非主流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右派”诗人流沙河，被打为“胡风集团分子”的曾卓、牛汉、绿原及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的诗人穆旦是其代表。他们同新生青年诗人群体共同构筑起了文革地下诗坛。这些青年诗人主要身份为知青，在相对封闭的山村开始地下诗歌创作，形成了一批诗人群体如“白洋淀诗群”、“贵州诗人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风景。第三帝国后期德国诗坛上也出现了一批包括君特·艾希（Günter Eich）在内的年轻诗人，然而他们的这个时期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未成气候，而是战后才逐渐在德国文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节 创作空间，传播渠道

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政府并没有全面取缔非法西斯文学，一批非法西斯作家仍然能够合法创作出版。然而他们只能在极权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内（如受到纳粹政府鼓励的历史题材）从事创作，其作品也不断受到严密审查。他们面对的是纳粹

文学和遭纳粹禁止的抵抗文学之间夹缝式的创作空间，其作品主要在以《德国评论》，《新评论》及《王冠》为代表的非纳粹刊物上得以发表流通。相比之下，从事反纳粹诗歌创作的地下抵抗派诗人面临的则是随时被查获、通缉、处决的危险，创作空间隐秘，作品传播主要通过传单、地下报纸、政治性小册子等非法出版物和国外反法西斯刊物。纳粹对待监狱集中营里的抵抗文学创作态度较为复杂，在某些集中营文学活动被禁止，在某些地方又甚至受到鼓励。总的来说，这种文学的创作空间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特定空间，而无论是秘密传播还是被当局允许，其流通起初都局限在一个小范围之内，战后才被部分整理出版。

文革期间，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被一概禁止，无论是流放诗人在监狱、牛棚、干校中的诗歌创作，还是知青诗歌这种民间个人写作方式都不可能具有合法性，因而多是秘密创作。与第三帝国时期的非法西斯诗歌创作相比，文革期间地下诗歌自为的写作姿态更加明显：这种诗歌当时不可能发表，没有目标读者，抒情姿态多为独白式。创作完全是个人表达的需要，是困境中的精神慰藉，甚至构成诗人的生存方式。地下诗歌的秘密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广泛阅读和接受，只有极小部分诗歌有少量手抄、复写、油印本流传。当时中国新闻出版管制极为严格，对外交往更是被严密控制，这决定了文革地下诗歌在文革之后才能够被整理出版。

第三节 创作主题，创作手法

第三帝国和文革时期非主流诗歌创作从创作主题、手法来看，都可以分为主要的两类：一类是直接对纳粹统治或文革激进的政治风潮、社会震荡作出明显和直接反应的诗歌创作；另一类是以隐晦的形式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投射到内心的深层感受，构筑远离生活表象的艺术情感空间，或者对社会政治风潮予以回避和悬置，选择私人化中性化表现领域的诗歌创作。

批判与反抗

面对第三帝国和文革时期反常、暴力的社会现实，一些诗人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作为创作的主题，通过诗歌表达自己对这些现象的极端厌恶与否定。

“游说者让我反感/……江湖术士靠花言巧语，骗子靠牵强附会为生，/救星，拯救欺诈，医生，畏惧死亡……” 弗里德里希·荣格尔（Friedrich Georg Jünger）在他的颂歌《罂粟花》中表露了对纳粹以民族救星自居，花言巧语骗取民众信任

的卑劣行径的反感。针对纳粹骗局，伯格伦在其创作于第三帝国时期，二战后才得以发表的诗作《谎言》中质问：“……哪一个民族的灵魂可以忍受这样的罪行毫发无伤？/长年累月谎言是我们每日的食粮。/……”文革地下诗歌中也不乏这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质疑控诉。“白洋淀派”诗人林莽这样诅咒专制的思想钳制：“庙宇倒塌了/迷信的尘埃中，有泥土的金身/没有星座、没有月亮/只有磷火在游荡/废墟上浮起苍白的时代”（林莽《二十六个音节的回想》（1974），引自李宪瑜：《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白洋淀诗群”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113页）。面对文革中人性与人的尊严的丧失，地下诗人黄翔将这个野蛮的时代比作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黄翔《独唱》，选自谢冕，唐小渡编《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89页），很准确也很形象的概括了那个野蛮时代的暴力、愚昧和残酷。这首诗的结尾鲜明地表达了一个醒悟者坚定的反抗意识：“即使我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可憎年代的咽喉”。反抗者的形象也出现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诗歌作品当中：“……我的心将会憎恨，它曾经憎恨的，/我的心紧紧抓住它的猎物，/这样没有人能将其粉饰，/这样没有骗子能乔装邪恶、/将被诅咒者从诅咒中开脱。”著名诗人丽卡尔达·胡赫在纳粹统治时期写下了《我的心，我的狮子》，指出纳粹的野蛮罪恶行径是“血红的罪责”，“……玷污/说出它们的嘴唇，/大地不能将其埋没，/火焰不能将其焚烧……”并将这种罪行比作被捕获的猎物，而诗人的心灵则正是“紧紧抓住它的猎物”“绝不放手”，无所畏惧的狮子。这里的反抗者不再是一根不肯被吞下的硬骨头而完全占据了强势，诗人在精神上对反动当局的蔑视表露无遗。

除了这种形式的抵抗作品以外，第三帝国和文革时期都还存在特殊的、非地下状态的抵抗诗歌。

第三帝国时期以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为代表的地下抵抗组织坚持在纳粹德国以文学为武器反对法西斯政府。他们通过散发传单，出版地下刊物，政治小册子来号召人民奋起反抗。一种只有两三行，包含某种政治性阐述或启发，用于

散发和张贴的押韵口号“张贴诗”被广泛运用。针对纳粹口号“人民，拿起武器！”，抵抗者有这样一首张贴诗的代表性作品：“黄油不便宜，/奶油价不低，/人民，拿起武器！”（引自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164页）简短易懂，用词、节奏都极其简单，因而便于记忆，作用直接是这类诗歌的基本特点。这种形式与其创作空间和传播方式相适应，是抵抗诗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发生于文革末期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一场由悼念周恩来引发的抵抗运动，其最为重要的抵抗手段是诗歌的创作流通。四五运动是文革历史和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学为武器抵抗专制的丰碑。然而群众情感虽然真实，表达这些情感的诗歌却依然遵循文革文学的创作规范，话语模式、组织方式都与文革主流诗歌极其相近，只不过把批判对象换成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四五运动的代表作品后结集成《天安门诗钞》出版。

自然诗歌

在一些诗人直接批判第三帝国和文革时期的残暴野蛮，鲜明表示抵抗决心的同时，还有一些诗人在高压专制的文化政策下选择了用隐晦的形式表达或者回避、悬置黑暗社会现实，自然类题材在两个时期的诗作中都多有运用。这种诗歌以其主观性、非政治性对抗标语口号化的主流诗歌，其中一部分还曲折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抵抗思想，是非主流诗歌的另一大组成部分。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的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顽强/它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跌进深谷/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曾卓《悬崖边的树》，引自《曾卓文集》第1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123页）这里的“树”分明是指代身处文革苦难风暴中的知识分子，而“风”则指代非常的政治气候。曾卓在狱中秘密创作了这首《悬崖边的树》，通过苍老、变形的崖树意象形象揭示了文革流放者挣扎于生死之间的生存境遇。除了抒写生存体验，动、植物意象也被用于展示批判和顽强的抗争精神。知青诗人芒克在《阳光中的向日葵》中把对人生的理性思考借植物意象转换成感性的表达：“你看到了吗/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而是把头转向身后/它把头转了过去/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引自董健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

史新稿》316页)。

文革时期地下诗歌完全自为的写作姿态决定了诗人们反而可以相对自由地通过自然意象言所欲言。相比之下，第三帝国时期的自然题材诗歌受到更多的牵制，更有悬置社会风潮，逃避到田园牧歌中的趋势：诗人对纳粹的认识不同，或者迫于当时高压的文化政策，转而以包括十四行诗在内的严整形式，高雅精粹的语言，私人化的表现方式对抗现实的混乱，与主流诗歌的一体化及其粗鄙语言风格抗衡。诗人贝恩曾追随纳粹，后在黑暗的社会现实前清醒，与纳粹保持距离，“用诗歌赦免自己”，在精神艺术的国度寻求慰藉。他的《紫菀》描写了一个夏日里“幻象般的幸福瞬间”：“……再来一次所盼望的，/陶醉，蔷薇的你——/夏天站着，靠在那里，/它在注视燕子，/再来一次一个推测，/肯定性早守在那里：/燕子们掠过水面/酣饮行旅和黑夜。”（贝恩：《紫菀》，钱春绮译，引自《[德国抒情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426页）

希望与理想

在批判外部世界或者描写自然题材的同时，诗人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也是诗歌必然关注的题材。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直接抒写诗人情感体验，表达对希望、理想等人生基本问题的思索，思考突破困境，实现拯救方式的诗歌在非主流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此类诗歌中，表达积极生活态度，激励受到磨难的民众燃起勇气的诗作占有很大比重。纳粹集中营中广为传唱的《布痕瓦尔德之歌》便表达了囚犯相信法西斯主义终将被战胜，苦难终将终结的乐观主义精神：“啊，布痕瓦尔德！/我们决不呻吟，/我们决不抱怨。/无论命运怎样变幻，/我们仍有生活的信念。/那一天终将到来，/自由降临在我们面前。”（集体创作《布痕瓦尔德之歌》，引自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178页）这种对未来的信念也鲜明的体现在文革地下代表诗人食指的名作《相信未来》中：“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郭路生《相信未来》，引自郭路生：《[食指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2页）“相信未来”

给予当时青年巨大的精神鼓舞，是一种人生的信念，是经历了现实失败后的别一种反抗精神，同时也是绝望现实的止痛剂，是受伤的一代人的心理疗法，它反映了一代人的精神历程。

两国诗人对于拯救道路的思考，以及战胜黑暗的寻求则体现了其文化背景和信仰方面的差异。带有基督教背景的第三帝国非主流诗人往往在信仰中寻找力量：“我相信，/神会在每一个困境中给予我们，/战胜困难所需的力量。/但是他不会预支这种勇气，否则我们会只寄望于他，不相信自己。/在这样的信仰中我们可以战胜所有对未来的恐惧。”职业为牧师的诗人伯恩霍夫在其诗作中把希望和勇气的源泉维系在上帝的身上。

文革流放诗人绿原则在《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 n 篇》中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认识：诗人夜不能寐，偷读《圣经》：“这时‘牛棚’万籁俱寂，/四周起伏着难友们的鼾声。/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 and 交待，/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到了这里一切希望都要放弃。’/无论如何，人贵有一点精神。/我始终信奉无神论：/对我开恩的上帝——只能是人民。”（绿原《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 n 篇》，引自《绿原自选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版 246 页）

结语

在第三帝国和文革时期极端异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对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文学创作强势干预，甚至全面掌控，使其具有一系列非常态的特征。

第三帝国和文革时期主流诗歌都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的基本特点：这些诗作运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遵循当局推行的创作规范，在其严密控制的出版发行系统中公开大量出版，广为流通。从产生渊源上看，这些创作倾向都在这两个特殊政治时期以前就存在。从作品主题上来看，在两个时期的主流诗歌中有一些共同的、出现频率很高的主题，如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对血腥、暴力的描写及对战斗胜利的幻想等。亢奋粗鄙和套语式写作则是其共同的语言特征。

这两个时期的非主流诗歌的共同特点首先体现在其非公开，甚至隐秘的创作空间、传播渠道，其与主流诗歌美学的疏离对立以及其语态的个体化上。除此以外，这两个时期的非主流诗歌也有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抗，希望与理想等一些共同的创作主题。与此同时，无论是主流诗歌还是非主流诗歌，第三帝国和文革时期

的诗作在其创作主体，对相似主题的处理表达手法等方面均存在一系列的不同之处。这是由两个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传统所决定的。

本文作者系旅德学者，本文摘自其学士论文。

【书评与序跋】

一代青年精英的文革思想史 ——读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何 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曾经爆发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大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论著却非常难于问世，而其中研究那一代青年的思想状况、青年思想者“足迹”的论著就更是少得可怜，几乎可以说是一片荒芜。因此，这部著作的问世，不能不让人感到由衷的喜悦。

作者的学术勇气首先就令人钦佩。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一个很难进行、也很难见到收获的“禁区”，而要闯入这个“禁区”中研究青年的思想、思潮，又比研究文革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国民经济以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历史状况等等，更加虚空抽象，更加缺乏现成资料，也更少先例，除了极个别人（如宋永毅对“异端思潮”的研究，徐友渔对红卫兵不同派别思潮的研究，杨健对文革“地下文学”和“知青文学”中一些文艺思潮的研究）在这方面作过探索外，作者几乎是要在蛮荒之地上开辟出一条路来。

作者的努力没有白费。这部书对文革时期青年思潮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对文革十年期间曾经先后活跃在老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其他青年群体中的一些或显（如联动思潮、极左派思潮、“新阶级”思潮、李一哲大字报代表的思潮、四五运动前后的各种思潮等）或隐（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或遭到批判从而没有得到传播造成影响）的重要思潮个案，本书都尽可能地搜

寻、荟集起来，作了客观的记叙与冷静的评说。在写作中，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钻故纸堆，寻找当事人或见证人、知情人，进行考察、采访，查阅和辨析、筛选、整理资料，沉溺其中前后近十年，个中艰辛，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

作者谦虚地称“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梳理是本书的重点”，本书在这方面也确实给人蔚为大观之感，书中对文革不同时期的重要青年思潮，作了分门别类的发掘和梳理，资料之丰富，涉猎之广泛，堪称一部文革十年青年精英政治思潮的“小百科”，正如徐友渔所说，本书已经成为“文革研究、青年研究、当代思想研究的必读书”。

本书的注释也很值得注意。注释不仅多，而且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不只有对书中引文出处的注释，而且还有对采访情况的说明，对历史资料的考订（如50页至52页注65、66、67中对《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即“003 通告”的详细考订），对同一资料不同文本的校勘，对有关人物的简历介绍等等，大大增强了本书“小百科”的分量。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把《“571 工程”纪要》作为“与一般青年立场迥异的另类政治思想资料”，在第五章第五节用两个小节的篇幅作了专门的、持论平和的研究。作者分析了《纪要》内容三点引人注目之处：第一，对党内最高层斗争局势的评估和对策；第二，对毛泽东的猛烈攻击；第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和政策弊端的激烈抨击。（349—351页）指出：《纪要》“如此胆大妄为地策划推翻以至谋害毛泽东及张春桥等文革势力的武装政变，如此毫无顾忌地谴责毛泽东政治人格和党内斗争作为，如此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文革以来的政策弊端，在中共党内恐怕是没有先例的，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言论竟出自‘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党章载明的毛泽东接班人林彪的儿子之手。”“仅就揭露文革以来的政治和社会弊端而言，《纪要》敏锐地抓住了当时的政策困境和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怨恨之处，其尖锐和全面程度，在当时的中国是仅见的，即使在同期的青年叛逆性思潮当中，能见诸文字的言论亦无出其右，其中很多揭露可谓切中时弊。”“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是，林立果及其《纪要》不是一般青年的单纯政论，而是与林彪以及林彪集团密不可分的。因而，不论当时人们的判断，还是后来人的评价，都不能仅着眼于《纪要》的文本。”（352—353页）作者还客观分析了这个《纪要》与林彪的关系，认为“林彪的真实面目至今

是一个谜……林彪与这个《纪要》的关系至今不明，很难说它是林彪集团认可的纲领。”（348 页）并提出：“林彪事件有太多的谜团。林立果（及其小‘舰队’）、林彪和林彪派系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纪要》是林彪的政治纲领，还是林立果几个人的主张？如果《纪要》只是林立果的观点，那么他与林彪集团多年的作为摆脱得了关系吗？如果《纪要》反映了林彪的主张，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林彪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被以林彪为首的一班高级领导人接受吗？”“其政策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领导干部的利益和人民的疾苦，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发动政变的策略、‘动员群众’实现其集团利益的口号？如果相信号召人民打倒‘当代秦始皇 B—52’的林立果，那么将如何处置那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林彪？……在诸如此类的诸多疑团化解之前，《纪要》难于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拥护。不用说当时很多中国人还没有摆脱林彪曾经卖力营造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想束缚，即使对毛泽东有所怀疑、批评的人，也很难在政治上相信林立果，或者不能接受政变和谋杀毛泽东的做法。”“谁能保证林彪等人为了争取党心民心，一旦当权，就会革除弊端，实现政治清明呢？反倒是《纪要》对江田岛精神的崇尚及林彪等人肆无忌惮的家族特权，令人不能不忧虑法西斯军人独裁的阴魂。”（354 页）

这一部分论述能够力避陈说，难能可贵。只是以《“571 工程”纪要》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为首的小集团草拟的政变计划要点”（348 页）为论述前提，尚可商榷。因至今为止仍然缺乏足够的实证材料来证实官方的这方面指控。在这方面仍然如整个林彪事件一样有“太多的谜团”。目前对《‘571 工程’纪要》的文本真实性及其被发现的经过等尚存许多疑问，更难判定其作者到底是谁，在本书分析的《纪要》三点引人注目之处中，第一点表现出《纪要》作者对党内高层斗争有较多了解，而第三点则表现出对下层的民间疾苦及被压抑的普遍民怨有较深切的体会——而这方面内容，似很难与长期生活于特权地位中的林立果相联系。

另一处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第七章“四五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中的第三节“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探索”，作者在这一节里专门用两个小节分别介绍了胡平和陈子明在文革中、后期的思想探索，并指出：“尽管尚未见到这两个思想倾向的原始文本，但是依据回忆资料，可以说这个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动向是在朝

着 1957 年甚至 1949 年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复归。”

（491 页）而这是在以往的一些相关论著中没有专门论及的。可谓填补了一个空白。

这样一部大著作，自然难免会有不足之处。在本书的上、下两编中，上编写文革前三年（作者称之为“红卫兵运动时期”），下编写“上山下乡和四五运动期间”，比较起来，上编有一个较明显的不足：主要着眼于北京地区的情况，甚至在讲到保守派红卫兵思潮（第一章第二节）时，也没有以其他省区更典型的例子作为研究对象。讲造反派红卫兵思潮（第二章第一节），也基本上不提其他省区的情况。只有第二章第二节讲“极左‘新思潮’”时才提到了湖南“省无联”、武汉“北决扬”等几个名气很大的典型案例。读上编，时时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作者只是在写北京地区的青年思潮而非全国的青年思潮。下编在这方面就好得多，不仅时间跨度更大，而且读后总的感觉比上编内容更充实，视野更开阔，新材料更多，涉及面更广。

除此之外，本书最大的缺陷，笔者认为只论及了青年精英的思潮，而未论及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青年大众的思潮。而在青年精英中，又主要是论及了学生青年的思潮，而较少涉及其他青年群体的思潮（已经涉及到一些，如青年工人遇罗克、史云峰，复员军人石仁祥，青年农民权佳果等，但与学生青年相比分量显然相去太远）。在本书的书名及上、下两编标题中就可以看出这一定位的局限。书名《失踪者的足迹》，显然着眼点是在那些足以载入思想史史册、作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精英方面，而忽略了青年大众的广泛的、世俗的思潮。书的上编是“红卫兵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下编是“上山下乡到四五运动期间的青年思潮”。以这样两个标题来概括文革十年的“青年思潮”，显然不够。上编中说“在此阶段，青年思想活动的存在方式主要是红卫兵运动。”（2 页）这样的说法就太片面。文革前三年“青年思想活动的存在方式”不能简单地说成“主要是红卫兵运动”，红卫兵只是对青年学生中群众组织的一种泛指（并非所有学生都参加了红卫兵，也并非所有的学生组织都是红卫兵组织，即使是造反派学生也有些并未参加红卫兵，这是常常被人们忽略的），而在文革前三年的群众运动中，工人、农民、商业职工、文艺团体演职人员、学校教职工、卫生系统医护人员及职工、党政机关干部，甚至军区机关、军队文体单位人员中，最先起来造反的和一

直在造反中起主导作用的，大多是青年。后来毛泽东提出的“老中青三结合”，所谓“青”，实际上就是指的造反派代表，而并非单指学生甚至主要不是指学生，看一看各省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看一看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即可知道，那些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大多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因此，讲青年思潮只讲学生青年甚至只讲红卫兵的思潮，显然是不够的。而在下编所涉及的1968至1976年间，以“上山下乡到四五运动”来概括，也显得偏重于学生青年，1968年后除了学生青年上山下乡外，城市里仍然有大批青年在从事各行业工作。并不等于全国青年都上山下乡了。若把“上山下乡”作为划分一个时段的标志性事件，倒不如使用同一时期的“群众组织解散”或“全国山河一片红”等来代替更全面一些。

另一方面，本书所论及的青年思潮，实际上只是青年精英中的政治思潮——而且只限于时政和政策批判、社会和制度批判等方面的思潮，而忽略了另一些曾在许多地区掀起过大波澜、影响过大批青年的思潮，比如一度弥漫全国各地的“揪军内一小撮”思潮，“揪叛徒”思潮，比如上海炮打张春桥、山西打倒“刘（贯一）、陈（守忠）、刘（志兰）”、四川打倒“刘（结挺）、张（西挺）”、黑龙江炮打潘复生、贵州炮打李再含等炮打“新生红色政权”中个别领导人的思潮，还有热衷于暴力和武斗、动辄“血战到底”的思潮等，除政治思潮外，本书很少或基本上未涉及青年大众的其他更广泛、更普遍、更世俗的（如文艺爱好、婚姻恋爱、时尚追求等等）思潮。而恰恰在这些方面的思潮更能反映出一些社会历史阶段群体性、本质性的东西。比如，在狂热的“路线斗争”高潮中，许多青年却消极对待“革命大批判”，宁可当“逍遥派”，埋头于“线路斗争”，大搞个人的“三线（毛线、塑料编织线、半导体收音机漆包线）建设”；又比如，在文革中后期，即中共各级新政权革命委员会、新党委建立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得到空前加强，“最革命”的舆论甚嚣尘上，“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叫得震天响的时候，许多地方的青年大众婚恋择偶标准却悄悄流行开了以“三转一响”（“三转”指三样能“转”的东西——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一响”指收音机）为时尚追求。在这种世俗思潮的冲击下，多年的“继续革命”宣传教育灌输的成果简直是不堪一击。这不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吗？列宁也不得不慨叹“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对青年中这类世俗思潮的研究，理应成为“青年思潮研

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本书最后一章第八章“青年思潮的主要流派”的最后一节“主要流派与中共党内斗争的关系”，颇为引人注目，因为文革中只要是被当作“反革命”案清查的青年思潮个案，当局均不相信那些青年能自己写出那样的文章或发表那样的言论，总是要追查案件背后“长胡子”的“黑手”（而当局在宣传革命领袖人物时又总是说他们如何在很年青的时候就独立写成了不朽的雄文或发表了杰出的宏论）。可惜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具体论述却不多。实际上，当时许多青年思潮并无高层背景。但要从思想根源上探寻其相关联系，还是有文章可做的。

读到本书结尾部分的这些话，笔者深为感慨：“文革期间青年的思想探索是艰险的，甚至是带血的历程，它使我们倍加重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建立和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探讨和言论的权利。”“他们的探索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启迪和激励人们摆脱专制愚昧，创造美好的未来。”（553—554页）今天的文革研究不是同样面临着虽不“带血”却依然艰险的现实吗？此书的写作与出版不是也在与当年的“失踪者”们一样继续着不懈的探索吗？

《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年出版。

【口述历史】

我怎样成了逍遥派 ——虞友谦研究员访谈

访谈时间：2006年4月12日

被访谈人：虞友谦研究员

访谈人：董国强、梅雪盈

访谈地点：虞友谦老师家

[虞友谦：江苏省社科院退休研究员。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江苏省哲学史与科学史研究会理事长等职。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

董国强：关于访谈目的和内容的说明（略）

虞友谦：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们正在溧阳果园参加建校劳动。这一段时间中央高层到底有什么斗争我们不知道。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这些底层的小人物已经习惯于随大流，丝毫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思考，甚至没有明确的自保的想法。

6月2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当时我们班大部分人都出去掏黄沙去了，因为要建校盖房子，需要大量的石头和黄沙，只留下我和其他7个人在家里劳动。我们在家的8个人听了这个广播之后，就在一起议论，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说：“我们要紧跟中央的精神，北大写了大字报，我们也不能落后。”于是就由一个人起草，写了一张赞成支持北大的大字报，大意就是说南大也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并就南大的具体情况，谈了南大文革有哪些不足之处，一共提出了八条意见。写完以后我们八个人都签了名，然后就贴出去了。

匡亚明当天晚上就坐着车子赶到溧阳来看大字报。当时溧阳分校条件很差，也没有路灯，他**就打着手电筒一张一张地看。学校政治部的人在旁边陪着他看。**匡校长非常激动，一边看一边随口就发表了一些评论：“这是一株毒草！”“这一个折中主义！”“这个是……”旁边政治部的人告诉他这个学生是哪个班的什么人。他说：“这个学生我知道，她是一个小宋美龄！”

当时我们听说匡校长来了，在看大字报，心里很不踏实。但又不敢靠近，就站得远远地在那里看。不过他和政治部干部谈的有些话我们也听见了。听到他的**这些评论，我们意识到闯了大祸了，感觉到可能又恢复到1957年“反右”的情况了。**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还比较老实，只能自艾自怨，以为这下子完了，肯定和当年右派学生的命运一样，或者退学或者下放劳动。而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尤其是那些干部子弟，他们非常想不通，表现出很强的抵触情绪，有绝食不吃饭的，有不睡觉的。几天下来，我们都被折磨得不像样子了。

哪知道经过几天的折磨之后风云突变。江苏省委派了宣传部副部长戴为然代表省委来看大字报。他看了大字报以后说：“这些大字报都写得很好啊！”当时匡亚明不在分校，学校政治部的干部听到戴为然的话以后都傻了。

接着就有人悄悄地跑来告诉我们这些写大字报的人，说省里面戴为然部长说了，大字报写得很好！但是我们不敢动，我们不知道谁对谁错，心里没有底。所以煽动了一天，学生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省委后来就继续派人煽动。那么总会有胆大的，就是那些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他们就第一批站出来控诉，说我们怎么怎么样受到匡亚明迫害……就把溧阳分校的火弄起来了。

到了6月10日左右，忽然来了一个紧急通知，让分校师生全部回本部。南京军区派了几十辆大卡车把我们全部拉回来。回到南大的时候，本部学生全部在汉口路两边夹道欢迎，把我们看作凯旋的英雄。进到校园里之后，南园8舍的一整面墙上贴着一张很大很大的大红纸，上面有几个很大的字——“光荣榜”，底下是我们这些在溧阳分校写大字报的人的名单，全部都是用金粉字写的。

当天晚上就在学校大操场召开大会。一开始主席台上方的横幅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在开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有人爬梯子上去把横幅拿下来，又换了一个新的横幅，内容已经变成“打倒匡亚明”了。

南大的火烧起来以后，省里面就派工作组到南大来。当时省委就是要稳住局势，把匡亚明抛出来也是为了稳住。当时除了匡亚明，还抛出了吴天石、陶白……等人，就是当时所说的“死老虎”。第一次省里面派省委常委汪冰石来南大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结果很快汪冰石就控制不住局面了，因为不断地有北京来的学生煽风点火。于是省里又派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来。那时彭冲在省里属于比较能干的干部，结果他来南大领导运动，很快也控制不住了。

当时作为我个人来讲，可能是因为学历史的关系，出于专业的敏感性或者说本能，往往不满足于表象的层面，于是不断地结合自己的境遇与当时的事态进行反思：我想从一开始我并没有任何要反党的企图，结果莫名其妙地就变成了一个“反党分子”；后来也并非我觉悟很高，就因为别人讲一句话，我又上了“光荣榜”。所以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这些人根本左右不了这个局面，整个运动都有人在后面拉线条，就像操纵木偶一样。所以后来我就对运动冷淡了。

最初我参加了省委支持的“黑字兵”。那是出于一种很朴素的想法而加入的，

因为我们在溧阳分校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是省委把我们救出来的，所以很自然地，省委工作组来了以后我们就跟着他们跑。最近我见到九十高龄的戴为然，还对他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你当年在溧阳分校把我们头上‘反党’、‘右派’的帽子摘掉，后来的境遇不堪设想。”他笑笑说：“不用感谢我，也不必怪匡老，当时大家对老人家（指毛）的意图都不清楚。”

我加入“黑字兵”不久很快就退出了。这中间有一个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校园里到处都在辩论。辩论的什么呢？就是有一批人接收到北京来的信息，就在那里鼓动大家起来造反，要把江苏省委搞垮；而我们这一批人是省委保下来的，我们就反过来要保省委，就在辩论中呼吁大家支持、拥护省委。当时我代表我们这一派参加辩论，某次辩论后，听众当中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人主动走过来和我打招呼，然后他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对我说：“我刚才听了你们的辩论，你什么地方讲的很好，什么地方讲的不太好，你应当怎么讲……”他就教我怎么讲。我就问他是哪个系的？他告诉我说他是省委的，还把他的工作证掏出来给我看了。乖乖！我这下才意识到，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举行辩论的地方，总有一些陌生面孔的人在听辩论，有的还做记录，有的还在拍照片，原来都是一些省级机关的干部和便衣警察啊！原来我就隐约有一些不好的感觉，现在有了这个心，我就注意观察。果然不错！这样后来我就不参加这些活动了。我感觉到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而且作为个人，在那个权力大动荡里面是左右不了局面的。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在文革期间的道路选择有很大的关系，我后来就成为长期的“逍遥派”。他们两派之间贴大字报也好，搞大辩论也好，我有时也去看看、听听，但是我自己就不写大字报了，也不参加辩论了。那么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持一种所谓“观剧的立场”，有时就看得比较清楚，所谓“旁观者清”。有的事情一经回味，不免哑然失笑。

当时学校里“主动参与型”的人不少，在学生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应该说这其中有不少人是真心“干革命”的，十分卖力、十分虔诚地“保卫毛主席”。但毫无疑问有许多积极参与的人抱有各种个人的目的。比如有的人家里条件比较差，再加上自己品质不好，通过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去“造反”、“串连”，结果“油水”捞得很多。最典型的是当时一个一年级的同学，他利用“造反”敲诈勒索，后来被抓起来了。还有一个同学家里条件困难，平时生活很艰苦，也没有什么好

衣服，结果从外面“串连”回来的时候，全身上下全是新的，包括皮鞋呀什么的全是新的。所以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吃饭又不要钱，还可以到处游山玩水！”这样的人大概有相当的比重。还有的人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捞取一点政治资本。那些人本来没有什么机会的，现在利用“造反”取得了一定的权力与政治资源，各种机会就比较多了。这个都是我从侧面能看到的。

当时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尽管我们班上的同学之间是有派性的，出去跟别人辩论的时候也很激烈，但是回到班上，大家就又都客客气气的，和睦相处，谁也不讲谁。偶尔讲几句观点不同的话，也不争吵，最多说一句“咱们骑驴看唱本！”这是我们历史系跟其他系不一样的地方。我知道南大有的系内部闹得很凶的。我们系里，闹呢也有一些，但是不太严重。可能是以前有一些个人恩怨，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协调，平时也没有机会发泄，正好有这个机会就相互发泄一下。所以这个文革，高层有高层的账，他们算他们的账。下面各个层次有各个层次的账。他们的账是不同的，目的也不一样。问题是高层“算账”非得把全国上下都拖进来陪着一起算，这大概就是属于政治斗争的奥妙了。

我成为逍遥派以后，就不大参加他们两派的活动了。那么整天没事干也不行啊！我就自己找点事干干，就去抄书。后来我对中医有一点了解，就是那个时候抄《本草纲目》抄的。抄书抄累了，就出去走走，看看大字报，听听辩论，看看热闹，也作一些思考。

有些集体活动也还是参加的。比如“忆苦思甜”。“忆苦思甜”属于那个时代的“背景音乐”，构成一种神圣的基调。只要是谁在“忆苦”，革命的光环立马在他头上显现，其他人都会对他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因为当时似乎有一种共识：出身愈苦则意味着革命性愈强。因此两派头头都不会放过这个表现的机会。但派性无疑是更强的东西。所以经常会出现令人尴尬的一幕：当某一派头头“忆苦”忆得声泪俱下的时候，对立派别却马上刷出大标语声明：某某搞假忆苦，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并随之抛出大批揭露对方弄虚作假的材料。这种情况，我在校园里不只看到过一次。

另外我还参加过一个活动。当时有一些理科学生，包括在南大很有名的温元凯，他们感到这样一天到晚胡闹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就自发成立了一个“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这个老温因生病时曾与我在校保健科合住过一个病房，所以彼

此较熟悉。他看到我未参加造反派，当时也没事干，就说：“你来当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历史顾问吧。”他们要搞一部“自然科学史”，我就跟他们一起搞，当时搞得很认真，还跑到图书馆作了大批的卡片。但是刚刚搞了两个月，就被造反派的革命积极分子们发现了，他们就贴出大标语，说学校里有一小撮人妄图干扰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勒令我们赶快悬崖勒马，否则革命的铁扫帚就怎么样……结果被他们这样一顿“棒喝”，我们这个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就搞不下去了，不得不散伙。

反正当时大家都干不了什么正事。整个文革期间我一直就呆在学校里面，没怎么出去。有时也回老家扬州，那是因为对我父亲的处境不放心。我父亲是一个资本家。文革初期南京的资本家戴高帽子游街，这在省里面是比较早的，我估计很快扬州也会如此，于是我就给父亲写信，而且回去过一次，告诉他这个运动很快会波及到扬州，让他做好思想准备。但是我父亲丝毫不相信，他说：“不会的，共产党是有政策的。”他还说：“你看到的那些戴高帽子游街的都是些不法资本家，我不会的，我对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实际上我讲了没多久，也就一个多月吧，扬州就开始了，也是挂着大牌子游街，然后是大规模抄家，我家被抄三次，父亲吃足了苦头。

所以在 1966 至 1968 两年多时间里，我基本上是脱离派系组织的。尽管两边的许多人都在拉我，但我始终都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到了 1968 年 9 月份，我就毕业离校了。

董国强：您是资本家家庭出身，这对您的个人成长有什么影响？

虞友谦：影响很大。不过我家的情况还与一般的情况有所不同。我父亲虽然是个资本家，但他是省政协委员，政治待遇还是很好的。因为他是著名企业家，在当地比较有影响。解放以后扬州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很器重他，曾经要他出来当扬州市工业局的局长。我父亲当时很犹豫，说这个事他要考虑考虑，就没有答应。这个事情以前我们不知道。到文革的时候他讲起了这个事情，我说：“你当初为什么不答应呢？当了局长，交出企业，入党都有可能的。”他说：“当时谁知道国民党还会不会打回来呢？如果国民党打回来那还得了？而且现在看来幸亏没有当那个局长，否则文化大革命一来，那就成‘走资派’了，而且是个‘打入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那样连命都没有了。现在只能说我是个资本家，还算是民

主人士，还是工商联的主任，还是民建的主委。我现在受到冲击是不假，不过现在大家都要受冲击，市委书记所受的冲击比我大得多。”

我的家庭出身对我有什么影响？我就感觉到从中学到大学，每次填表填到“家庭出身”一栏的时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种耻辱。而且文革期间每次听到说什么“我们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哎呀，一听这个话，头就大了。讲这个话好像很全面的，很客观公正的，“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嘛！但是在我的头脑当中，你讲这个其实就是“有成分论”，你讲的目的就是强化人们的“成分”意识。所以我的心里压力很大。家庭出身对我整个的成长和我的个性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在班上要批判我的话，一般都是批判我“明哲保身”。这当然与我的个性有关系，另外也跟自己的处境有关系。有些话可能别人讲是没事的，我讲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所以我遇到问题脑筋里总要多转两个弯子。

讲到文革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当时造反派把一些老教授关进“牛棚”。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老先生为了要自保，有很多奇妙的表现。那时候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每天都要进行劳动，扫地，打扫厕所。干完活了以后，还要写思想汇报交给造反派。其实这种汇报写得多了，造反派根本也不当回事，交上来了就随便放在办公桌上。于是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几个老先生写的思想汇报，内容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就指责别人，有的就自己诉苦。其中最奇怪的一篇是H先生写的。他在这篇思想汇报的开头讲：一定按照红卫兵小将的教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行动，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这都是当时流行的一些空话、套话。但接下来的内容就不敢恭维了。我记得里面有这么两句话：一句是“我绝对不会像韩亦琦那样顽固”；另一句是“我也不会像王绳祖那样狡猾”。我看到这里，H先生原来在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怎么能把自己的个人恩怨掺杂到思想汇报里面呢？——韩亦琦也是我们系里的一个教授，因为他有一些所谓“历史问题”，本来在系里就一直受到压制，即使不搞文化大革命，他的处境也不是很好；王绳祖曾是老“金大”文学学院的院长，当时是国际关系教研室的主任。我估计可能H与韩亦琦和王绳祖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好，这个时候就乘机把他们踩上一脚。这个事情就说明在文革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大家受到的压力很大，结果各人为了自保，就有各种莫名

其妙的表现，实际上是属于“灵魂的扭曲”。

董国强：你刚才提到温元凯，他是匡亚明树起来的标兵，他对匡亚明应该是有感情的。那么溧阳分校发生学生反对匡亚明的事件，温元凯站在哪一边呢？

虞友谦：温元凯不是溧阳分校的，他是理科学生，是化学系的。匡亚明在 1964 年就开始树他，因为当时温元凯的表现非常突出，曾经写了具有很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化学通报》上。匡亚明是很爱才的。他 1963 年从吉林大学调到南大，一直就比较重视知识分子。我可以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曾经有两个化学系的年轻教师抬着蒸馏水在校园里走，正好匡亚明从办公室出来，看到这件事情，他就问：“你们是那个系的？”他们回答说是化学系的。匡亚明又问：“你们是工友还是教师？”他们回答说是教师。匡亚明马上就说了：“啊？你们是教师，还干这个事，那工友干什么呢？以后你们不准干这种事情，你们有你们的工作，这种事情叫工友去干！”哎呀！这两个教师听了这个话，感激得五体投地呀！感到匡校长真关心我们、爱护我们啊！

而且匡亚明在每个星期六开校会讲话，我们听下来的感觉就是他讲的都是一般干部不敢讲的话。因为他级别高，敢讲。比如他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老教授不拥护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也没什么妨碍；你思想上反党也不要紧，只要行动上不要反党就行。”这都是他在大会上讲的，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还有 1964 年给教师晋升职称。解放以后很长时间没有晋升过职称，南大很多人的职称还是解放前获得的，有的老讲师解放后熬了很多年，到四十岁出头了还没有升上副教授；有些更年轻的教师则什么职称都没有。所以 1964 年这一次晋升职称影响很大。像中文系的叶子铭那一年升讲师，当时他只有 27 岁，是南大最年轻的讲师。匡亚明对他很欣赏，升了讲师以后，学校开大会请叶子铭现身说法，讲“又红又专”问题。叶子铭就讲：“‘红’是灵魂，一个人没有灵魂不行，没有灵魂的人就变成行尸走肉了；那么‘专’呢，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你只红不专，那就是魂不附体了。”匡亚明听到这里，马上就站起来跑去拉着叶子铭的手说：“讲得好！讲得好！”然后又转过身来对大家讲：“叶子铭老师今年只有 27 岁，已经当上讲师了。我知道历史上诸葛亮是 27 岁当军师的，我们叶子铭老师 27 岁当讲师，一点都不比诸葛亮差！”他这样一讲，就讲得比较生动，不像一般老干部讲话那么教条。

所以文革以前南大的人都知道匡亚明是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他的确比较关心知识分子，跟一般老干部不一样。到了文革以后官复原职，他也还是这样。历史系很有名的王绳祖教授文革前住的是一栋小洋楼，后来在文革期间他被赶了出去，这个小楼就被中文系的一个讲师长期占用，她家先生是市委机关的一个小头头。文革以后匡亚明一上台，马上就要有关部门将那个小楼退还给王绳祖先生。哪知道中文系的那个老师就是不退。汇报到匡亚明那里，他就在一次大会上跟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讲：“你们必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你们中文系党总支解散！如果一个月还弄不好，我这个校长就不当了！”他是在全校党总支书记大会上讲这个话的，所以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结果这个教师不得不搬出去。

董国强：那么从常理上推论，温元凯应该是保匡亚明的……

虞友谦：他也不存在保不保的问题，因为他是匡亚明树的标兵，匡亚明被打倒了，他反而跟着受过很多罪，当时很多大字报——估计有两千份以上吧——就专门揭批他，称他是“修正主义黑苗子”，“瘟君”，“瘟标兵”。他成了被批判的靶子。

董国强：那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虞友谦：是的。他这个人脑子很灵活，可以说是绝顶聪明，也有正义感。有一次一队中学生红卫兵拦在南大食堂门口，要每个进食堂吃饭的人背一段毛主席语录，背不出就不让进去吃饭。许多同学怕背不出尴尬，弄得不敢去吃饭。老温知道了，就想了个办法把这些中学生赶走。只见他昂首阔步走到食堂门口，按要求背诵了一大段毛主席语录。中学生放行了，老温却不进去，他反过来要这些中学生也背出他指定的一段。那些中学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背得出来。于是老温以当时最高的政治调门把他们训斥了一顿，并勒令他们立即解散。我当时和老温在一起，很佩服他的作为，但也有些替他担心。

董国强：您自己参加过“串连”吗？

虞友谦：我大概在国庆前后去了北京一趟。

董国强：南大的“黑字兵”是在什么时候散伙的？

虞友谦：大概是在国庆之前就不行了（注：此处存疑。大量文献资料显示，包括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在内的“黑字兵”解体于1967年初“一·三事件”以后）。当

时南大“黄字兵”的“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比较厉害，还有一个中间派别叫“红色造反兵团”。其实这个“红色造反兵团”大体上就是原来的“黑字兵”。他们之所以改换旗号，就是因为当时形势所迫，“黑字兵”已经无法存在下去了。我就是跟着“红色造反兵团”进北京的。

董国强：您对造反派武斗的大概情况了解吗？

虞友谦：武斗的时候气氛是很紧张的。不过到1967年7月份高潮的时候，我正好因病在江苏医院住院治疗，没住在学校里面。但是有同学经常跑到我这里来，我也就知道了一些情况。当时的局势相当紧张，好像武斗已经一触即发。外边纷纷传言“红总”就要攻打南大了，南大“八·二七”那边就打出标语，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化学武器！结果实际上没打起来。

但是其他地方的武斗我是知道的。像江苏医院那边就在打，其中一派在一棵大树的树叉子上绑上粗粗的大牛皮筋，把一大块水泥预制件弄成四块，几个人抬着拉着一弹弹出去，打在江苏医院的窗子上，整个窗子都打散了。不过南大没打起来。后来“八·二七”跑掉了。我班上有个同学就是“八·二七”的头头，与我处得很好，他跟我讲过一些情况。

董国强：您说您在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初期稍微活动了一下就退出了，然后一直逍遥到1968年秋天毕业离校，这前后有两年多的时间，您就是抄抄书，看看热闹，那么学校里面面对大家的活动也不进行干预吗？

虞友谦：那个时候学校里面也讲过多少次“复课闹革命”，但实际上复不起来，一直是乱哄哄的。有的时候上面也统一传达一些文件，而其中最靓丽的风景就是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每当此时，总要敲锣打鼓、欢呼庆祝，有时我也跟着列队游行。而广播、报刊等宣传媒介这时总是要发表相配合的文章，说“又一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云云。

不过参加“战斗队”的那些人确实都忙得很。像我们班上有参加“战斗队”的，我看他们校内校外川流不息，的确很忙。其中也有人搞文字工作，比如有的人编红卫兵小报，有的人搞毛泽东诗词的注解，还有的人搞鲁迅语录之类的东西。

董国强：您是哪一年进南大的？

虞友谦：1963年。

董国强：1963年秋天进来，到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那您实际上只读了两年半

的书，后面就没有正规地读书了。这样算起来，您实际上大学阶段就是两年半。

虞友谦：是的。不过我们这一班跟上面的 62 届还不同，我们比他们还稍微要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比我们早进来一年，但是他们下去搞了一年“四清”，所以他们也是读了两年半的书。而且“四清”的时候系里的中青年教师都下去了，所以我们这一班的课程都是那些老教授们上的，例如我们听过韩儒林、王绳祖、陈恭禄、蒋梦引、王栻等人的课。所以我们还知道一点这些老先生讲课的情况。他们当时都是全国第一流的学者，讲起课来生动自然，绝不刻板。比如韩儒林教授解释一个元史词汇，追本穷源，旁征博引，足足讲了两个小时；王绳祖教授则非常潇洒自如，他讲到俾士麦的外交手腕，说他如同杂技演员把五个球抛向空中，一个也不落地，玩弄欧洲诸国于股掌之上；最有趣的是陈恭禄教授，那时只让他讲“历史文选”，这是所谓“工具课”，本来是没有多少意思的，但是他在课上却会提到王少堂（注：著名扬州评书艺人）说书的掌故。他们没有一个照书本讲的。这种待遇后来的学生们都没有了。在这之前他们这些老先生也是不上课的，主要是怕他们“放毒”，哈哈……

董国强：您到 1968 年秋天毕业，毕业以后情况怎么样呢？

虞友谦：当时讲“四个面向”（注：即所谓“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就是要把我们下放到最基层接受“再教育”。这是中央定下来的。所谓“下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到公社生产队插队落户，住在农民家里；一种是集体安置到农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到农场里的处境要比到生产队农民家里好。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插队到农民家里的，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与贫下中农实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其实农民是纯朴的，也是非常现实的，他认为你们是“知识人”，你们拿工资，也不会侵占他什么利益，跟他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所以他对你就很客气。反过来那些到农场的人就麻烦了，农场里面管起来很严格。我夫人就是到安徽城西湖农场的，那是个军垦农场，在那里从小兵到场长都认为你们这些大学生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是来改造思想的，你们就要听我的。他们就是这种心理，所以对那些去劳动的大学生就非常严厉。

董国强：您说的两种不一样的去向是由你们自己决定吗？

虞友谦：不是的，我们是由上面分配到县，到了县里就看你的运气了。他如果决定将你插队，那你就去插队；他如果决定把你弄到农场，那你就去农场。

董国强：您刚才说你们下去是带工资的？

虞友谦：是的。

董国强：那你们干不干活呢？

虞友谦：我们下去以后是这样的，讲起来你还是要服从生产队的劳动安排，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那些农民——包括生产队长——都认为，你们大学生能干什么啊？我们多你一个人也干不了什么事，少你一个人也坏不了什么事，要考虑安排什么适合的农活还很费心劳神的。农民们就这个心理。后来他们给我们安排什么工作呢？当时上面不是经常组织农民办大字报栏吗，那正好，就由你们大学生搞去吧！因为我会画几笔画，所以我后来就变成了办大字报栏的专业户，成天就是搞大字报，搞漫画栏。不但替生产队搞，还替大队里搞。我在那里一年多就专门搞这些东西，真正下田干活倒没有过。喔，下过几次田。干什么呢？就是让我拿个竹竿子，在竹竿上扎些稻草，去赶秧田里的麻雀。后来时间比较长了，彼此都熟悉了，那个大队的民兵营长就跟我说：“我给你一杆猎枪，你看到麻雀多了就开一枪。”后来我就照他讲的，拿着猎枪站在那里，麻雀来了我就开一枪，哈哈……他们并不为难我们。他们的心态不像军垦农场里的那些战士。

不过那些农民也很有意思。因为他们都很朴实，就很容易受到当时片面的舆论宣传的影响。他们总认为大学生都是很愚蠢的人，连小麦和韭菜都分不清。所以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他们也经常想取笑我们。有一次他们一本正经地问我：“你知道花生是长在树上的还是长在地下的？”我晓得他们受当时那个错误舆论的影响，肯定以为我是不知道的，那么为了满足他们那种心理，我也就一本正经地回答他们：“花生当然是长在树上的。”他们就哄堂大笑。后来时间长了，他们终于明白我们大学生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愚蠢，就说：“啊，这些大学生真坏，他们什么都懂，是捉弄我们的。”哈哈……

农民们是很朴实的，但是他们受到当时整个意识形态与生产方式的影响，又接触不到现代文明，所以他们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我插队的地方在苏北泗洪，那里地处偏僻，背山面湖，交通不便，没有任何通讯设施，广播嘛就是公家的广播，整天宣传的是“农业学大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艺节目就是“样

板戏”之类，不是你自己想听什么就能随便听的，所以农民们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当时就发现他们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比如在劳动的时候，几个农村妇女在一起谈笑，谈的都是些趣味比较低俗的笑话。忽然大路上老远看见一个人影子，还在几百米以外，这时候大家马上就把手里的农活停下来了，就站在那里看，一面看还一面在那里猜测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等到这个人走过去了，他们又议论：这个人长得怎么样，穿戴怎么样，大概这是个干部……一直等到这个人走得远到看不见了，才又开始干活。这大概就是他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不过农民们也不傻，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有他们的智慧。比如当时挑肥料，妇女们一起拿着扁担箩筐排队在那里站着，一个人拿着铁锹负责把肥料装到筐子里面。第一个人的筐子装满了她不走，在旁边等着。然后第二个人过来，装满了以后也在那里等着。一直到大家都装好了，然后排成一条队来走。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了表现一下自己的劳动积极性，我有时候也过去想帮她们弄。那个拿锹的副队长对我说：“这是妇女干的事情，不需要你来干。”我说：“弄完一个以后就可以走嘛，干吗非要等在那里一起排队走，就像扭秧歌一样？”他说：“这个都是长时期形成的，万一有公社的干部来了，看着好看。”然后他又悄悄对我说：“其实这七八个妇女干的活，一个男劳力一次就可以干完了”。这完全是一种形式化，他们心里都有数。

有的时候开会喊口号，年纪大的人会喊错，比如应该喊“打倒刘少奇”，他一下子喊成“打倒毛主席”了，大家都看着他，他也晓得没办法交待。不过在农村有农村的办法。农民辛苦一年养了一头猪，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猪赶出来杀了，把全村的人请来，再把大队、公社的干部请来，说是杀了一头猪，犒劳大家。这样宴请一顿，就把这个事情摆平了。这是非常生动的东西，也非常真实。

据我当时的观察与后来的反思，农民缺文化，却不缺智慧。有些也许是出于生存本能而产生的当下直觉。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我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长姓周，这个人比较能干，他对内采取一套专制霸道的管理，对外也有一套无赖“办法”为队里争取资源。比如附近淮河边一个石灰厂，原料和产品的陆路出口，就靠一条穿过该生产队大田的土公路。每当周队长急需用钱的时候，就鼓动社员去路两边挖土，扬言要把路挖断，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做做样子。那么石灰厂领导知道了，自然会出来请周队长喝酒、谈判，

让周队长敲一笔竹杠了事。当然这笔钱也有生产队的份。我在生产队一年半，看到过几次，屡试不爽。

周队长以权谋私是公开的行为。社员们私下与我们交谈时，无不怨声载道，诅咒者有之，骂娘者有之。我们这些旁观者觉得，这样的领导者迟早要遭到农民反抗的。终于等到上面派工作队进村“整顿干部”了，周队长也在整顿名单上。工作队先找到我们，我们就把农民们的怨愤如实反映了。然后工作队分别找农民谈话、听意见。我们以为这一下农民们一定会大肆揭发，趁机赶周队长下台。谁知结果大出所料，全生产队几乎无人向工作队揭发、抱怨，反而说周队长如何能干，如何一心为公，是个好干部云云。只有一个姓薛的“楞头青”说了一点实话，反映了一点意见。结果工作队忙乎一阵走了，周队长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受到表彰。而那个姓薛的“楞头青”则遭到周队长的报复。报复的方式也很有时代特色。周队长宣布要把生产队里的大批判栏砌在他家门口，让他家出入不便。最后还是“楞头青”的老母央人说情、赔不是，送了一些礼，周队长才作罢。

那时我们年纪轻，缺乏处世经验，对此百思不解，背后问一些老农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说：“周某这个人干队长，坏事做得够多，但他还是有些办法的。他虽然贪心，但干了这么多年，该捞的也捞足了，再捞也有限。假如你把他轰下台，换了别人，能力不如他且不说，在‘贪心’这一点上不会有多少变化，反而新上来的都是些饿‘虱子’，吸血更凶，结果会更糟糕。再说回来，工作队的人情况也复杂，说不定其中有跟周队长有瓜葛的，会通风报信给他，谁知道呢？如果我们如实反映情况扳不倒他，那时我们就要‘吃不了兜了走’了。就算我们这次能够把他赶下台，新上来的人也廉洁，但这个周某是不会安分的，他捣起蛋来队里也不得安宁。所以不如顺水人情说好话。周某知道大家如此对他，今后或许会厚道些。”听了这番话，我当时如醍醐灌顶，对农民的智商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我也隐隐感到悲哀，这实在是中国传统社会培育出来的弱者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到底是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呢？

董国强：对那时农村文化生活的贫乏，我有亲身体会。我父亲在 1969 年被下放到六合县四合公社插队劳动，我们全家也跟下去了，我当时只有 7 岁。但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在冬天的夜晚，那里有走江湖的艺人，其实也谈不上是“艺人”，大概就是稍微懂一点乐器，你说他是“说书”的也好，或者说他是“唱戏”的也

好，反正三、五个人一伙，他们的要求也不高，就是生产队给他们拿一点粮食，他们就在晚上来连唱带讲地热闹一下子。当时他们唱的什么我不懂，也不知道好坏，不过他们讲的那些故事，什么杨六郎啦、鬼怪啦之类的，现在看来都是自己胡编乱造、即兴发挥的，没有什么根据。但是那些农民们都听得很认真，笑得很开心，到了该散场的时候还有点意犹未尽、恋恋不舍的样子……

虞友谦：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在那边待遇比较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会讲故事**。

我插队的这个生产队有一个老干部，他当年曾经跟罗瑞卿是一个党小组的，后来他的腿在解放战争的时候被打断了，当时他的家乡已经解放了，他就没有跟部队走，自己跑回家去了。这种擅自离队的做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不过他虽然当不成官了，还算是“特等残废军人”，所以在当地依然有相当高的地位和声望。每年县民政局大概要给他两百块钱，另外他还在生产队拿工分。这个人姓朱，在家里排行老三，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当面都叫他“朱三太爷”，而背后就称他“朱三瘸子”。国家每年给他的钱一拿到手，就有赌友上门找他赌博，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输个精光。钱输掉以后，他就扛着“特等残废军人”的牌子到处“打秋风”。他就是这么个人。

他自己整天没什么事，我去了以后他就来和我聊天。我有的时候跟他讲讲笑话。他听说我会讲《水浒》，欢喜得不得了。他说他好久没有听过了，就要我讲给他听。可是我心里不大情愿，我害怕这个事情传出去，会有人指责我在那里搞“四旧”，惹上麻烦。谁知他缠住我不放，还说他会保密。最后没有办法，我就给他和几个干部讲了一两次。乖乖！这以后我的待遇大为改变！他们也不要我劳动了。经常是只要朱三瘸子请客，他们就把我叫过去。过去以后，还拿着酒叫我跟他们一起喝。当时的酒质量是很差的，是山芋酒，也没有什么菜，但是他们一定要拉着我。他们还创造了一个比较符合当时主流话语的说法，说我们目前的这个人员组合是最好的组合！朱三太爷是老革命军人，是“枪杆子”；老虞是大学生，是“笔杆子”，共产党就是要靠这两杆子！当地那些干部看在朱三瘸子的面子上，对我就非常客气。另外，在偏僻农村，医生是最受尊重的。有个姓秦的土医生会打针、会开常用西药，也懂中医。我们大队的书记娘子小产造成血崩，半夜里请了他来，他打一针仙鹤草素，血就止了。所以大家尊他为“神医”，平素

以“秦大先生”呼之。每次朱三太爷请我，也都少不了他的。

在农村与农民共同生活的两年里，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那时一般农民令人难以想象的贫穷。他们连赵本山小品中所说的“家用电器”——手电筒也买不起，所以普遍过的是天黑睡觉、天亮即起的自然人的生活。但他们虽然几乎一无所有，却**大都很善良，并不缺乏人性**，尽管客观大环境经常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这最后的底线。在艰苦的煎熬中，他们还是默默地坚守。也许他们靠的就是良知与常识。反之，当时社会上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他们从权力到金钱应有尽有，但他们缺少的却正是农民们所保守的这一点人性的残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讲农民最高尚，并未说错。

我们在农村的生活还可以，吃的苦不算多。那些中学毕业的“知青”跟我们就不同了，他们吃的苦比较多，因为他们要在生产队里拿工分，跟农民有利害关系。另外，他们大多年龄偏小，有的初中毕业就下放了，毫无生活经验与社会实践，到一个新地方，举目无亲，自然处境很艰难。

董国强：那么像您这样的人在当地的密度有多大？

虞友谦：似乎用不上“密度”这个概念。当时就是选择一个“点”，在我那个“点”一共有八个人，其中四个是南大的，我是历史系的，还有一个是政治系的，一个是数学系的，一个是生物系的，另外四个就是其他学校的，但都是本省的。我们八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家庭”。

我们本来是在农民家里吃饭的，后来发现问题了。因为我们是国家供应的口粮，每月三十斤定量。生产队长说：“让你们跟农民吃一样的吧，都吃稀饭，他们过意不去；让农民给你们单独煮饭吧，你们吃干的他吃稀的，不太合适，也很麻烦。所以不如分开好。”

情况的确如此。比如我当初在农民家吃饭时，就把三十斤粮食全给农民了，结果弄得他很为难。他们是很朴实、很本分的，每次都是替我单独煮干饭。我说不要，我的粮食都给你了，就和你一起煮、一起吃吧。他不好意思。我走过去把他的锅盖打开，根本看不出里面煮的是什么，反正连汤带水一大锅黑糊糊的，味道也很不好闻。他不让我吃这个东西。我在的这家农民非常勤劳，也很善良，我们相处得很好，没有什么矛盾。

那个数学系的同学老王住的那家就比较麻烦了。那个农民本来就比较计较，

而我们这个同学老王饭量又大，结果就产生矛盾了。一开始老王也和我一样，把三十斤粮食全部交给那个农民，而且不肯单独煮干饭，要和他们全家一起吃稀饭。那个农民也很高兴。哪知道我们这个同学肚皮比较大，他吃一碗稀饭感觉不够，还要再吃一碗。那个农民看到这个情况，第二天做饭的时候就再加一碗水，把稀饭弄稀一点。这个同学一看饭变稀了，他就吃三碗。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弄得两边都不开心。这个农民就跑到我们家里说：“我们家老王不像你，他太能吃了！”老王没办法，后来只好偷偷跑到县城自己买一盒饼干。

所以后来队长说：“干脆你们自己做饭吧。”就给了我们一个小房子。

现在想想很有意思，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就产生出这些笑话。

梅雪盈：你们八个人在一起住吗？

虞友谦：住还是住在各家，就是吃饭的时候在一起。后来因为我地位提高了，大队书记就把我弄到他家里去住了。

这个大队书记当时三十多岁，他办事比较公平，在大队里面口碑很好。不过我住在他家的时候发现他的一个秘密。他因为家庭条件好一点，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听到他在收听“美国之音”。这是完全出于我想象之外的事情，那个时候听“美国之音”属于“偷听敌台”，是一种明令禁止的犯罪行为。我当时心里还嘀咕：“大队书记这层干部怎么这样呢？”他听了“美国之音”之后还跑来跟我瞎讲，说“美国人要炸长江大桥”。我就问他：“你是从哪里听来的？”他说他是听“美国之音”说的。我说：“你可不能瞎听、瞎说啊！”但是他不在乎。他地位高，在大队说话没有人敢跟他顶撞。

农村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多得很。比如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工分单价仅八分钱，实际上没有非常有钱的人。我们刚去的时候，看到有户人家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地主分子”。我们看看他家的房子也很破旧，和周围其他人家没有什么不同，大概唯一的不同就是这家人家的门口铺了几块青石板，比较平整一些。那家的户主姓张，是一个老头。后来我就问生产队长：“这个老张家以前住的房子在哪里啊？”队长说：“他一辈子都住在那个地方。”我一听这话，就感到这个“地主”成分的划分完全是人为的。可能土改的时候他家的情况比别人强一点，可能是因为他比较肯劳动，或者是因为他比别人会经营一点，那么土改的时候就给他挂了一个“地主”的牌子，他就变成了另类了。以前我们以为土改的时

候划成分是按照土地和财产的占有量来划的，实际上不全是那样的。有的是按指标摊派的，你这个地方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两个“地主分子”的。

当时“地主分子”的处境是很差的，每当生产队有什么公益性的事情，就安排他去做。例如我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到县城有一段距离，我们买的一些农副产品比如花生啊之类的不太好带，于是我们就去和队长商量，想找个人帮我们挑到县城去，我们付钱。队长一听就说了：“不要付钱啦，我找老张给你们送过去。”然后队长就带着我们去找这个地主，给他派公差。我们在路上就和这个老张边走边聊，我们问他：“你陪着我们去到县城，这个是不是要落工分的啊？”他说：“这个是没有工分的，我这是出公差。”他似乎已经很习惯了，觉得给他安排这些工作都是应该的。

董国强：您刚才讲你们那个地方离县城七公里？

虞友谦：那是从公社到县城的距离，如果从生产队到县城得十五公里。我们从生产队到县城一般不走公社，而是走一条小路，相当于三角形的斜边，稍近一些。但须翻过一座山，渡过一条河。没有公路，都是乡间土路。要走好几个小时。来回需要近一天的时间。他挑着一个担子把我们送到县城，到了县城我们请他吃饭，他不肯吃，说还得马上赶回去。最后我们就买了几包香烟给他。

梅雪盈：一般的农民在乎这些地主吗？

虞友谦：不在乎，农民和地主平时的关系还不错。但是处在那种大环境下就需要一些这样的靶子，就需要有能让别人表现其革命性的工具，那么他就是这个工具。这个老张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我们那个年代这种笑话是很多的。我记得我在农村中学当老师时候，学校里经常要组织阶级教育活动，就找老贫农来作报告，当然事先要对他们做些引导，但他们一般文化程度很低，当他们说出一些大实话时，结果就闹出笑话来了。比如要揭露控诉地主阶级的剥削本性，老贫农就讲：“某某地主是很坏的，我们在他家打工，到了农忙的时候，他为了让我们卖命，就做油炒饭给我们吃，不吃油炒饭就没有力气。”学生听了以后就说：“去！我们现在都吃不上油炒饭，地主给他吃油炒饭，怎么还说地主很坏呢？”有时忆苦说豁嘴了，也会说出“最苦还是三年困难时期”这样的话来，结果弄得大家很尴尬。所以当时很多宣传本来是要达到特定目的的，但是一接触到真实的现实，就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了，反而闹

出许多笑话。

我们在农村接受了两年“再教育”，然后重新分配工作。我就被分配到一个农村中学教书去了。

董国强：“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您有什么想法？

虞友谦：其实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前，我们这些大学生都能看透了，都晓得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九·一三”事件出来以后，我们并未显得对这事特别惊愕，大家私下里反而议论：这下子看毛泽东如何解释这个事情。因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宣扬毛泽东是“洞察一切”的神，而林彪又是被说成毛考察了几十年才选定的接班人。现在林彪出了这样的事，至少说明毛泽东并不能洞察一切。进一步说，就自然会对“接班人”制度产生质疑了。若再换别的角度思考，值得反思的内容就更多了。当然当时最高当局刻意回避这些，也不让人们思考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教室里面有什么事情，旁边的教室里有两个学生在那里讲话。那个时候农村学校里教室都是很简陋的，中间虽然有墙隔着，但是墙壁中间都是空的，所以他们在那边讲话这边都能听见。我本来没有在意，后来听听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两个学生在讲什么呢？其中一个在学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一段唱词：“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这是日本鬼子鸠山队长劝中共地下党员李玉和投降的话。另一个学生马上就讲：“一点不错，确实如此！”我当时听到这个话很吃惊啊！他们才十三四岁的小孩子就说这个话！

当时的人们都处在一种绝望当中，因为社会太无序了，人们都缺少上进心，缺少奋斗精神。我那个时候在学校里也是应付，主要的事情是自己看书。我在那段时间基本上通读了先秦诸子。

董国强：您现在回过头来想一下，文革对您有什么影响？或者讲，亲历文革您有哪些亲身感受？

虞友谦：我感受最深的是我的世界观，我看问题的方式有很大的改变。我本来就对庄子很感兴趣，《庄子》里面讲人的命运是自己控制不了的东西，什么叫“命”？“命”完全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过程，是你自己干预不了的事情。

从文革走过来，我就更加相信一个人的遭遇是自己无法控制的，在一个没有民主法治传统的社会中更是如此。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历史的进程往往和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及其个性、品质有关。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当然从马克思主

义的唯物史观来讲，他这个个人的好恶、品性等也是有一定的经济因素和经济基础的。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受到他个人意志的摆布是毋庸置疑的。

【史林一叶】

1969 年毛泽东何时到湖南视察？

陈益南

1969 年时，毛泽东到过湖南，并对湖南党政军负责人黎原、华国锋等人作了指示，这一点是肯定无疑了。因为，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中，有此事的一个线索：1969 年 12 月 25 日，在中央拟下发的《转发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擅自传达毛泽东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及附有的湖南省黎原、华国锋等人署名的检讨报告文件中，毛泽东批示了“照办。”

这说明，毛泽东在 1969 年的确到过湖南。

问题是：第一，毛泽东是何时到的湖南？第二，毛泽东在 1969 年到湖南究竟来过几次？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的《中共湖南省党史大事年表》是这样说的：

“（1969 年）11 月 12 日，毛泽东来湖南视察，听取了华国锋和黎原的汇报。毛泽东对湖南局势的发展表示满意，指出：前年来时还是急风暴雨，去年上半年也是高潮，现在看来形势很好，以后可能还会出点什么事，但大局不会有变化了。他说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要教育团结多数。大多数人是好的，干部解放后可以调换一个地方工作；即使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抓人多了不好处理。他还说，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去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中央、省、地、县四级机关人多。”

《中共湖南省党史大事年表》在这里明确指出，1969 年，毛泽东是 11 月 12 日到湖南。

据说，《中共湖南省党史大事年表》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来源，是 1978 年时，省档案馆从中央档案馆于一份没有具体日期的、1969 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

湖南时所作的重要指示》，复印而来。

2003年发表在《党史博览》第12期上的《建国后毛泽东的57次离京》（作者袁小荣），则记载了毛泽东在1969年6月和11月两次到长沙的情况。文中所记载的1969年11月12日到长沙一说，显然是被1992年出版的《中共湖南省党史大事年表》误导。

文革中在湖南参加支左的解放军47军宣传处负责人、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振祥先生，于2000年《湖南党史》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1969年毛泽东来湖南视察的时间问题》一文中，则提出：毛泽东不是11月12日到湖南，而是当年6月28日来的。

李振祥的根据，是1996年5月间，原47军军长、首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黎原在会见他时，应李的请求，特地带了一份《毛主席视察湖南的指示》记录稿，让李看了。在那份记录稿上，毛泽东视察湖南的日期是1969年6月28日。

但是，这份记录稿所记述的内容，却又与上述《中共湖南省党史大事年表》中所说的内容，基本相同。

支持李振祥看法的，更有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逢先知、金冲及，他们在其主编的《毛泽东传》（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第1561页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在1969年6月28日，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文革中湖南的一个群众组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

逢先知、金冲及在书中引用的这个情况，也清楚注明了是来源于《1969年6月28日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谈话的记录》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毛泽东在1969年，究竟是6月28日，还是11月12日到湖南？显然，毛泽东不可能在两个不同的时间里作出同样的谈话指示。

或者，是不是毛泽东在这两个时间中，都到了湖南，而除上述毛泽东的指示外，还有一个另外的指示？

对于这些疑问，由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1840—1990》中，却没有任何关于1969年毛泽东来湖南的记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是空白。

然而，黎原的记录稿日期，虽清楚表明毛泽东是6月到湖南，但是，上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中央批评湖南擅自传达毛泽东指示的文件草案，及毛泽东的批示，却是在12月25日，即离6月28日很远（近半年时间）、而离11月12日很近。这样看来，似乎毛泽东是11月来湖南的可能性比较大。

对此，李振祥有一个解释，他认为：6月28日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即召开了全省地市级及支左部队负责人共71人，由华国锋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然后，再由黎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归结为十一个方面的问题、及其解决意见，作了一个总结报告。但是，在会后印发的《传达提纲》中，并未明确公布毛泽东来湖南的时间。由于当年6、7、8月间，湖南不少地方暴雨成灾，当时省及各地市革委会的工作重点，都放在防汛抗洪中，故直到11月12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才得以召开第四次全会，重点传达学习上述毛泽东的指示，在印发给与会的省革委委员学习的文件中，也未公布毛泽东来湖南的日期，而只说这是毛泽东最近来湖南时所作的指示。由此，后来的人便以为11月12日是毛泽东来湖南的日子。

不料，党中央对湖南省未经中央批准，就如此大范围地擅自传达毛泽东的讲话，对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批评。于是，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黎原、华国锋、杨大易三人联名，就此事向中央写了一个检讨。同时，采取措施，予以收回、销毁发下的毛泽东讲话文件。这份文件销毁很彻底，甚至连省档案馆都没有留下备份，以至文革后，省档案馆还需要到中央档案馆复制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内容。

这样，1969年毛泽东到湖南来的时间，在湖南便没有任何正式记录资料了。所以，后来很多人写文章、著书，凡涉及到1969年毛泽东来湖南的时间，便要么没有具体日期，要么则以省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开幕的日子，当成了毛泽东来湖南的时间。

李振祥的解释，理由较充分。只是，他仍没有说清楚一个问题：既然当年湖南已将有关毛泽东讲话的传达文件销毁，那么这个“11月12日”，又是怎样被人们误认的呢？

毛泽东是于1969年6月28日来的湖南，现在，这已可确定。那么“11月12日”的时间问题，是不是也同时存在？即是不是毛泽东也于11月12日又一次到了湖南？

其实，我们从毛泽东的有关离京外出巡视情况，便可认定，毛泽东只有6

月 28 日那次到了湖南，11 月 12 日那次不可能来。

因为，据当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副大队长陈长江的回忆（《毛泽东的最后十年》），与武汉东湖宾馆有关资料，以及叙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情况的著作《梅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便可知道，1969 年国庆之后的 10 月 18 日起，毛泽东就再次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下了，而且直至第二年（1970 年）4 月，半年时间中，他都没有离开过武汉。为此，中央警卫团也特别来了一个有 120 人的大队伍，驻在东湖宾馆。

毛泽东在这期间，曾发生过三件大事：

10 月 19 日，林彪的所谓“一号战备命令”的电话记录，传到了武汉东湖；毛泽东看后，对此非常不满，即要汪东兴“烧掉！”（电话记录）。

12 月 26 日，毛泽东 76 岁寿辰，也是在东湖宾馆度过的。

1970 年 3 月 7 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从武汉回北京，向周恩来总理传达他主张不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但是，毛泽东在此期间，却没有到过湖南或其他地方。

因此，1969 年毛泽东来湖南的时间，确是只有 6 月 28 日那一次。

2009/5/13

【蓦然回首】

鞋底风波

胡显中

鞋底，对于一般人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意义，除非是刑事侦察人员，可以从中找到破案的线索。可是在那疯狂的年代，红卫兵小将们竟然从一双双凉鞋的鞋底上发现了问题，而且据说是个很大的案件。

长春市郊的铁北有家“新生塑料厂”。公安部门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劳改单位。据说是为了把犯有不同罪行的人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叫做“新生”。该厂生产的产品中就有各种颜色、不同款式、不同型号的塑料凉鞋。

文革“破四旧”高潮中。有红卫兵小将突然从这个工厂生产的凉鞋鞋底上发

现了严重问题：部分鞋底的后跟部分有三道横纹，中间被一道竖纹间断，在竖纹的一头，还有一小短纹。瞧！这不正是一个“毛”字吗？把伟大领袖踩在脚底下，这还了得？难道不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吗？自命为‘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们，迅速采取革命行动：

第一、马上奔赴各个大街小巷，检查所有行人脚下的鞋子。如果发现有上述花纹的，勒令脱下来，并且严厉训斥一顿，诸如：革命警惕性到哪里去了？阶级敌人的阴谋都看不出来？等等。行人只好乖乖地光着脚走回去。

第二、马上追查生产单位，当然很快就查到了新生塑料厂。好呀，原来是些劳改犯人在那里生产！这样一来，更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劳改犯，竟然贼心不死，在继续搞反革命活动，掉着法儿污辱伟大领袖，这无疑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勒令该厂立即停产。这还不算完，还要进一步追查罪魁祸首，查来查去，当然查到了设计模型的工程师。原来也是个劳动教养后就业的“分子”，好像姓纪吧？有了斗争目标，就必须穷追猛打：每天晚上都要拉到人民广场上去批斗，战绩当然很是辉煌：被斗者鼻青脸肿，当时许多人估计肯定要杀头。

但是，后来什么罪也没有定成，那个姓纪的“分子”仍然搞他的凉鞋设计，只不过要仔细许多了。再就是把那种样式的凉鞋成品全部从仓库里取出来，每人一把小刀，用小刀把鞋底的花纹削去一小块，使之看上去不像“毛”字了。还有就是把所有的旧鞋一律收回、销毁，作为补偿，每双旧鞋，不论新旧程度，都换给一双同样型号的新鞋。那些几天以前光着脚走回家去的老百姓也都换得一双新鞋，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读者也许会问：这件事情你是如何知道得如此详细的？在下当时就在那个新生塑料厂被“劳动改造”，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犯”，而且正是在这个车间里从事凉鞋的生产，被认为“污辱伟大领袖”的那种鞋，有些就是由本人生产出来的。至于大街小巷行人光着脚走路的情节，则是在平反以后，工作之余聊天时听到许多当事人亲口所说的。

【蓦然回首】

独特的挂牌

陈仁德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很有些功底，这是一些行家评说的，他们说我父亲的颜字写得有模有样。

这样一来，父亲就难免要尽一些义务了，街道上需要写什么“选民榜”、“安民告示”之类的，就请我父亲去帮忙。父亲也乐此不疲，有求必应，当成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那年到处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忙着成立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我们那个街道也不例外，也要成立新生红色政权——二街道革命委员会。新生红色政权的李主任是刚刚“解放”出来的街道干部，他找到我父亲，要我父亲为二街道革命委员会写一个挂牌。我父亲当然答应了。

过了几天，李主任来看挂牌写好没有，父亲就笑呵呵地把写好的红色大字给他看。李主任戴着老花眼镜反复看了好久，才慢吞吞地说：“写错了呀！”

我父亲很吃惊：“什么地方错了？”

李主任很认真地说，“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革命委员会好’，是吧？”

父亲说：“是啊。”

“可是你把‘好’字写掉了。”

父亲急忙解释说这是写挂牌，如果把“好”字也写进去，就成了“二街道革命委员会好”，成了标语，不是挂牌了。

“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是这么说的，必须写上去！”李主任加重了语气。

父亲知道不能再解释什么了，就照李主任的意思将挂牌重写了一次。

几天后，热烈欢呼热烈庆祝二街道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隆重举行，革命委员会的挂牌高挂在会场中央，会后又被举着全城游行，好不热闹，但是人们却十分惊诧，怎么这个挂牌与众不同，上面写着“二街道革命委员会好”？

这个挂牌一直挂在街道办事处的大门上，红红的，没有人去把它取下来，直到文革“胜利结束”以后。

【文摘】

姚文元曾做过我的指导老师

陈冀德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姚文元了。与北京的李希凡相对应，人称“南姚北李”，是文艺理论方面崭露头角的新人。

认识姚文元，则是在五九年底，作协上海分会召开的文艺思想批判座谈会上。我和戴厚英等一批来自高校中文系的学生，是在会议中间参加进去的。会议以批判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创导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为题目，针对的，却是国内文艺理论界。因为，他们张扬人道主义、人性论，从舆论上影响了，乃至妨碍了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贯彻。

起初，参加会议的是各大院校中文系的老师们、报刊、出版社的编辑们。但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深受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并且，继续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奉之为当时文艺理论领域的经典。批判会自然开不下去了。于是，有关方面和会议的主持方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从本市的三所高校中文系，调集了一批学生和青年教师参加会议。与老师们、编辑们唱起了对台戏。

在这个批判会上，我认识了姚文元。当时，姚文元是作协党组成员。党组成员轮流主持会议。但姚文元似乎从未主持过会议，也很少在会上露脸。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在一次会议组织的联欢活动上。批判会从五九年底开到了六零年初。元旦过后不久，会议即将结束时，作为庆贺会议胜利闭幕的余兴。作协在沧浪亭摆了十几个台面。请与会者们吃一顿。饭后还有舞会。正当大家济济一堂，尽情享用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难得一尝的菜肴时，只见一个穿着灰布军便装、戴一顶耷拉着帽舌的灰布军帽的人，在席间穿来走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这就是姚文元。

与我同桌的作协党组书记郭信和，眼光追随着姚文元，咯咯的笑个不已。姚文元意识到他要找的东西在我们这一桌，就走了过来。他只是瞧着郭信和，不尴不尬地站在那里。也不说话。郭信和笑道：小姚，你走来走去的干吗呀？是不是想早点溜回家去陪金英啊？姚文元噤着嘴，只见嘴巴在动，不知在说些什么。郭信和这一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在作协机关工作的人，都凑过来了。七嘴八舌地要姚文元拿钱出来请客。这才知道，姚文元又拿到稿费了。再看姚文元，这哪像是个大作家呀？也不见有一点斯文相。最后，还是郭信和出来打了圆场，

把被她藏了起来的姚文元的一只黄绿色军用背包，递给了他，说，今天就放你一马啦。看在金英的面子上。客，总该请一请的吧？交给我了。实报实销，如何？姚文元接过背包，依然不吱一声，转过身去，逃之夭夭了。

看着姚文元离去的身影，我忽发奇想。都说文如其人。事实恐怕未必。姚文元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文笔相当的泼辣。逻辑严密，条理清楚。而眼前的这个姚文元，如果在他背着背包袋里，戳一杆秤杆子出来，这不就活脱脱一个上门收购旧书报杂志者的形象吗？

憨厚中带着窝囊。

姚文元成为我的指导老师，是在我分配到作协文学研究室工作之后。作协四十九天文艺思想批判会结束以后，参加会议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大部分回学校去了。复旦、师大、师院三所院校的中文系，各有两名学生被留了下来。作为大学毕业生，正式分配到作协机关下属的文学研究室工作。我和戴厚英都在其中。我们虽然学的是中文系专业，但在文艺评论上总归是新手。因此，作协党组安排了这方面的专家，作为我们的指导老师。凡是我们写的文章，照例，必须先交给指导老师看过。同意后，方能拿出去发表。姚文元被指定是我的指导老师。姚文元虽然也是作协党组成员，却从不见他坐班。连他的人都极少照面。只是在我刚分配到文学研究室工作时，辅导我写过一篇小杂文。以后，就再也找不着他了。

他也许从来就没有认我这个门生。

但在我来说，不管怎么样，一朝为师，终身是师。人间尚有“一字”师，我就曾有过这么一位“一文”师。我曾因工作需要，阅读过他写的大部分文章。当时，对我的这位“一文”师还是很佩服的。

在单位里找不着他。六四年，我随孔罗荪去丁香花园写批判托尔斯泰文艺思想的文章时，却又经常能够见到。

见了面，彼此也不招呼，更不对话。就跟陌生人似的。

丁香花园内，有一个很大的园子。园子边上有一条水泥铺的走道。工作之余，我常常会踩着从伙房偷偷弄出来的黄鱼车，在走道上兜着玩。一般人都以为，踩黄鱼车与踩自行车是一回事。其实并不。把握黄鱼车的笼头与把握自行车笼头使的力有所不同。胡锡涛是骑自行车的能手，他见我这个骑自行车要有人在后面扶着的人，骑着黄鱼车悠游自在的样子，挺不服气的。他要和我比拼踩黄鱼车。

擂台摆起，华东局《内刊》编辑部的人和写作班子的人都来助兴。姚文元当时也在场。这次比拼的结果是，胡锡涛踩着黄鱼车，一头撞到走道边的夹竹桃树丛里。夹竹桃的枝桠挑落了他戴着的眼镜。幸好，人没伤着。

此情此景，围观的人们惊惊咋咋的。唯独姚文元，视而不见似的，双手抱胸，站在一边，一声不吭。

事后，我问胡锡涛，姚文元与他下棋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冷漠？不苟言笑？胡锡涛说，才不呢。输了棋，他会耍赖。

六五年，姚文元关起门来写《海罢》的文章，作为他的助手，罗思鼎小组办公就在武康路2号二楼，也是处于戒备森严的绝密状态。可能是为了来罗思鼎小组处查找资料，或者与他们一起研究文章上的事情，在此期间，姚文元曾到武康路2号来过多次。见到我，也跟不认识似的。每次来，都会留下到吃了午饭再走。姚文元衣着非常随便。吃饭似也极不讲究。武康路2号一天三餐都是从延安西路市委机关食堂送来。一般情况，送饭师傅每次都会稍稍地多带几份饭菜。一方面让就餐者有点选择余地。一方面，万一来了客人，也可以应急。姚文元留下吃饭，从不要求通知食堂增加饭菜或带点好菜。到了吃饭时间，随便拿上一份，有坐就坐，没坐就站着。唏哩哗啦地吃了起来。碗里的饭菜倒是吃得干干净净的，但在他的嘴边、乃至衣襟上，都会留下不少的饭粒和菜汁。他一点不在意。挎上他的那只几乎永不离身的黄绿色军背包。招呼也不打一个，一走了之。

从作协四十九天文艺思想批判会之后，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一直是文革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喉舌。文章的任务一篇接着一篇。篇篇都是政治任务。他的拘谨、极少与别人沟通，恐怕与他的工作性质有着很大的关系。试想，与人交流，说一些今天天气哈哈，你好我好大家好之类，没意思。而他撰写并发表评《海罢》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在那里指挥，当时的市委书记陈丕显、曹荻秋等人一起参与过讨论，这些，他能说吗？当然不能。我有点同情他，他仿佛是在生活在一个不允许与别人沟通、只能自闭的境地之中。因为，他充当的是政治传声筒的角色。所以，对他的种种不近人情之处，也就只有理解两字而已。

六七年初，姚文元与张春桥一起受中央文革指派来上海指导工作。他在武康路2号和张春桥一起会见了写作班徐景贤、朱永嘉等人以后，单独留了下来。当时，正值晚餐时，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正好还剩余有两份冷饭、冷菜。他和

罗思鼎小组的朱维铮两人就这样吃了起来。

六七年初的武康路2号，夸张点说，有点像列宁攻打冬宫前的斯莫尔尼宫。它是造反派们活动的中心。底楼、二楼办公室人来人往，乱哄哄的。罗思鼎小组的人把姚文元带上了三楼寝室。我也跟了上去。

姚文元就这样一边站着，饭粒、菜汁飞溅地吃着，一边与罗思鼎小组的人有说有笑。从认识姚文元以来，我是头一次看到他和周围的人有说有笑的模样。仔细打量这时的姚文元，一身戎装。军大衣披着。看上去，虽然并不显出英武，但以往的邈邈相是全然不见了。只有吃饭时的一副吃相，依稀还是当年模样。也依然不和我招呼，形同陌路。

徐景贤考虑到他现在的身份，回家多有不便。就把他的爱人金英接到武康路2号。于是，我的宿舍就成了他们夫妻鹊桥相会的地方了。我带着姚文元下楼到我的宿舍。他爱人金英已经在那里了。我不认识金英，姚文元也不给我介绍。

正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五十年代，姚文元的关系还在作协机关的时候，曾认购过500元公债券。一直存放在作协机关主管后勤的杨仁初那里。文革以后，单位里乱哄哄的。杨仁初怕万一丢失，对姚文元没个交代。便把这500元公债券交给了我。让我得便时转交给姚文元。

当我到楼下办公室里取了公债券返回宿舍的时候，房门依旧开着。只见夫妻俩相对而坐，刚才与罗思鼎又说又笑的姚文元又不见了。他对我去而复返，问也不问。我把公债券递到他手上，他随手往桌子上一放。我急了。500元，几乎相当于我大半年的工资。杨仁初把它托付给我，我是有责任的。我说，你倒是放放好啊。姚文元用他那双水泡眼瞪了我一下。总算把公债券塞到军大衣的口袋里去了。

我转身替他关上了房门。我的宿舍，虽然在整幢楼房的一个角落。万一给人发现，我倒没有什么，姚文元岂不麻烦？

此时此刻，上海的造反派还不知道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到了上海哩！

我与姚文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老实话，说不清楚。领导与被领导？不那么直接。我与他中间，隔着好几级阶梯呢。师生？我是这样想的，可他未必认同。朋友？更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反革命团伙？岂非把毛泽东推到了反革命团伙头子的位置上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那末，为什么我们又时常会关联在一起呢？

从五九年起，在作协文艺思想批判会认识；

一起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

辅导过我写文章；

一起在丁香花园，武康路2号文革前市委写作班共过事；

在他和张春桥的促使下，文革前市委写作班集体造反；

造反后，武康路2号一度成为他和张春桥与上海各路造反英雄们的会所；

《朝霞》丛刊创刊号，送给上海市委所有领导人手一册，只有他表示支持与鼓励；

看到《外国文艺摘译》以后，也只有他，提醒编者，每期刊物的前面，必须有导读文章，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有所批判；

《朝霞》事件后，他对萧木说，正式任命我担任副主编，是否对工作更有利……

一直到后来七六年五月的那次谈话。

不知道姚文元怎么看待这些关联。我觉得，无非是党内思想路线、派别斗争的需要罢了。只不过，他是车马炮，我是小卒子而已。

七六年五月，我在济南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后北上北京，原本是只去见张春桥的。不知为什么，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把我找了去。当时我猜想，多半是《朝霞》事件的关系。姚文元在《朝霞》事件之后，曾要萧木带信给徐景贤，要他认真地再读一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去掉一些私心。他这次把我找去，也许是对我在《朝霞》事件中的表现的一种支持和鼓励。

在见过张春桥后的一天晚上，萧木把我从《红旗》杂志社的招待所接到姚文元的住处。我曾一直以为姚文元和张春桥是在一起办公的。萧木告诉我，毛主席提醒王、张、江、姚不要搞上海帮以后，姚文元就主动搬出钓鱼台了。

也许因为是夜里的缘故，视觉有些模糊。姚文元的住处，像是一所过去京官们住的，有好几进深的老房子。姚文元的秘书接着我们以后，在黑咕隆冬的走道里，弯弯绕绕走了好些时候，才来到一间感觉大而无当的会议室。会议室只在进门的一头亮着灯。整个房间昏昏暗暗的。桌椅、墙壁看上去都非常陈旧。我们还

没坐定，姚文元就进来了。

话题自然从济南召开的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说起。姚文元自己也是鲁迅研究者。对这次会议似乎一直很关注。他说，周海婴（鲁迅之子）给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提出，当前在鲁迅的研究上，存在着否定一切的倾向。这就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起因之一吧。

还说，《光明日报》的内参上，有你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我们都看到了。你的观点是对的。否定也是继承的一种方式。否定一切就不对了。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倒洗澡水不要把澡盆里的孩子都倒掉了。都是这个意思。

接着，讲到发生在一个月前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他说，当时，政治局的人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站在会议室的窗前，可以看到广场上的景象。人头攒动，一点不亚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那样的场面。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上也是暴力。还是恩格斯说得对，阶级斗争，最终还是暴力解决问题。（注）

从姚文元处出来，我问萧木，房子这么大，又这么破旧。办公厅的人怎么也不帮忙收拾收拾？萧木说，他们哪里会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身上穿的军大衣，好几年了，都磨破了。没人管。还是张春桥说了话，他们才给换了一件。

“四人帮”刚垮台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对林彪，一下子就恨起来了；对刘少奇，是恨了很久才恨起来；对邓小平，是怎么也恨不起来；对“四人帮”，则早就恨在心里了。我后来想，是不是办公厅的人在那时候就把姚文元恨上了？

回到住处，我把姚文元刚才说的那些话，尽可能地写了一点回忆笔记。我觉得，朱永嘉对我这次来北京的期望值是太高了。指望着我能多拔几根鸡毛，拿回去让他当令箭来使。其实，我心里明白，张、姚想见我，决不是要我去汇报工作。或是想通过我传达什么。既非汇报工作，又没有传达的义务。所以，在见他们的时候，没有做笔记。回到住所，趁着记忆犹新，记上几笔备忘。主要是回写作组对朱永嘉有个交待。

我是住在《红旗》杂志社用来接待来京写作或修改文章的作者的招待所里。与我大学时住的学生宿舍差不多。简陋得很。而且我住的这间房，房门正对着烧水的锅炉间。人来人往的十分嘈杂。

叫我更头痛的是，每当我见过张或姚的次日，胡锡涛都会到我的住处，软磨硬逼，要我透露一点“新的精神”给他。我是一句没有。为此，胡锡涛从此不再叫我的名字。就叫我阿庆嫂（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主角）。滴水不漏。我回敬他，叫他胡司令（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反角，草包司令胡传魁）。

胡锡涛是个满世界跑的人。从北京到上海，凡是见到熟人，就说我这个人不够朋友。是个绝情之人。我一点也不生气。因为我也是个编辑，知道“上面的精神”对于编辑来说，确是至关重要。但，一则，实在是无“精神”可说，再则，即便有，按着我的个性，我也不会张扬的。

“四人帮”垮台以后，当《红旗》杂志社的清查小组要胡锡涛把七六年五月我去北京的事说说清楚的时候，他对姚汉荣说，当时，真是恨死了这个人。现在，感激涕零。阿庆嫂滴水不漏，还真是救了他一把。因为，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的清查组都认为，七六年五月我去见张、姚，与七六年十月发生在上海的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有关联。如果当时，那怕我只跟他说上一句、两句，他就给搅到阴谋武装叛乱的事件中去了。倒一辈子霉去吧。

从北京回上海后，连家都没回，朱永嘉把我直接从机场接到写作组。等着现炒现卖。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办公室里除了朱永嘉、王知常、还有徐景贤，没有其他。我根据自己的回忆笔记，把张、姚对我说的话，尽可能详尽地作了汇报。完后，我的记事手册就一直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所以，在“四人帮”垮台前，除了前面说的三人，再加上萧木（在北京与王、张、姚见面的事，都由萧木安排并陪同）。没有向任何人再说过此事。包括我的丈夫张春生。

在认识姚文元这长长的十几年里，他总和我说过几句话，屈指可数。而七六年五月的那次谈话，我在他那里待的时间前后不到一小时，他对我说的话，却是比十几年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在我见到的三个人中，他也是说话最多的一个。

张春桥是听我说，只是表露出他很愿意听的样子。

王洪文，则是话没有说上几句，就忙着吃喝玩乐。之所以见我，恐怕是做给张春桥看的。

从六七年初，姚文元与张春桥受中央文革委派，联袂回上海指导工作，并且，

从此以后，凡是公开场合，有姚必有张，有张必有姚。像个连体人似的。这种现象，在从古到今的官场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少见。而且，在我心目中，姚文元和张春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因此，一直以来，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总是挥之不去。他们之间的联合是一个怎样的联合？也许因为姚文元是个文人，而张春桥是个政人。文人要有所依附，政人要有所宣扬，互相需要罢了。但从姚文元和我的谈话中，使我感到，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姚文元和许多文人一样，对权力的兴趣，不及对文章的兴趣。他的有关阶级斗争的种种理论，从老祖宗们的经典中来，然后运用到他所写的文章中去。写得头头是道，而在实际的权力场中，却是一个没有实践能力，或许，是个不想去争去抢的权力盲。所以张春桥能够与之联合。

姚文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书呆子。

（注）

一九八〇年底，我从看守所出来，被安排在市印刷六厂包装车间劳动已经一年多了。忽然有一天，宣传部负责与我联系的人通知我，收拾行李去北京。

当时，林彪、“四人帮”一案即将开庭审理的事已有耳闻。把我叫去，自然是陪“四人帮”接受审判。家里的人有些紧张。我倒还好，死猪不怕烫。反正就这么一回事吧。

与我同机前去北京的人中，我认识的就一个，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到达以后，何秀文就与我分开了。听说，他去了部队的招待所。我被安排在西苑宾馆。

巧了。一九六〇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海代表团的住地，就在这西苑宾馆。物是人非。昔日的堂上客，今日已是阶下囚了。

我住在宾馆底层浴室对门一间可能是临时拾掇出来的房间里。电灯、电话俱全。洗澡就在对门。行动是自由的。

至此，我还不知道叫我来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过了一、二天，可能是检

察院的人，通知我，要我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指证姚文元。指证他是如何通过与我的谈话为上海武装叛乱出谋划策的罪行。

莫明其妙。

“四人帮”垮台以后，关于七六年五月姚文元与我谈话的这件事，毫不夸张地说，交代过不下几十次。但我敢肯定地说，没有一次是把姚文元的这次谈话与上海的武装叛乱相联系的。检察院的这一事实从何而来？而且，在通知我作证之前，既没有问过我愿不愿作证，也没有向我这个证人核实证词。这个被誉之为世界瞩目的审判，在这些细节之处，也太不讲究司法程序了吧？

虽然，我是“四人帮”一案的涉案人员。但对这次审判，和许多人一样，寄以厚望。一方面，通过司法介入来解决共产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史无前例。感到新鲜。还有点莫名的兴奋。毕竟，此举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想到要法治了。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审判，能解开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个心结，“四人帮”究竟是怎样阴谋篡党夺权的。

现在倒好，要我为姚文元这一子虚乌有的罪行出庭作证。说有，是伪证。说没有，是拒不作证。这不里外不是人吗？

思之再三，我给有关方面写了一份思想汇报。提出了我对要我指证姚文元这件事情的看法。其一，姚文元在我七六年五月去北京见他时，的确对我说过，阶级斗争最终还是暴力解决问题这样的话。但他同时还说，这是恩格斯说的。他是用恩格斯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来看天安门广场事件。这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的一句套话而已。其二，姚文元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七六年五月的北京。我回上海向写作组领导朱永嘉汇报，也是在七六年五月份。而上海的武装叛乱，发生在七六年十月份。姚文元怎么可能未卜先知？

思想汇报交出去以后，过了几天，来了许多人，房间里坐得满满的。像是主持与我见面的人（来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既不自报家门，也没人向我介绍。我不知该怎么称呼）说，我的书面意见，有关方面知道了。他们之所以今天来找我，是要我当着他们的面，再次阐明一下自己的想法。这有何难。思想汇报上怎么写的，我就怎么说了。并且，再三声明，我不是拒绝作证。只是从这次世人瞩目的审判，怎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角度来考虑的。

坦白地说，如果一定要我上法庭作证，那末，到了法庭上，非但不是指证，反过来为姚文元辩解的事，我也不是做不出来。但我不是一个奸刁之徒。遇事当面敷衍，临了来个突然袭击。这种有悖于为人之道的事，我也决不会做的。我想这满屋子的人中，总会有几个明白人在里面吧？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时，想得最多的，当然还是这次审判“四人帮”的事。司法介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无前例。是个进步。但是，也许正因其没有先例，看上去总有些走样的感觉。

证人出庭作证，本是检察部门的事。可是，通知我来北京的，是上海市委宣传部。这又是那一出？证人的证词，未经核实，就要求其出庭作证。有这样的规矩吗？还有，检察部门是从哪儿取的证？从证人的交代材料中？我从未有过姚文元七六年五月与我的谈话和七六年十月上海发生的“武装叛乱”有关联的交代。那末，是从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的交代材料中？也就是说，从张三或李四那里取证，叫王二麻子出庭作证。闹到最后，还不是事实。

司法的严肃性何在？

这次开庭审判“四人帮”一案的时候，有关方面一再强调、反复重申：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就交给历史检验去吧！

节录自《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8 年 7 月第一版。

【闲读偶记】

值得注意的文革文物造假

渔歌子

《记忆》今年第十一期（总第二十一期）发表的卜伟华《一本文革研究的参考书——介绍《证照中国：1966—1976》》一文中，谈到了该书中“一些有疑问的藏品”。

比如，以“中共中央文化部”名义发出的《报告会入场券》，其内容是：“（一）向知识青年金训华学习（二）于会游同志主持”，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晚七时”，地点是“北京清华大学内”。

卜伟华指出：“这张入场券的格式、时间、主办单位都有问题。把大会的主持人名字写在入场券上很少见。于会游这个名字未曾听说过。中共中央文化部的名称不伦不类。”他还指出，金训华是 1969 年 5 月到黑龙江插队的上海知青。到农村 77 天后的 8 月 15 日为抢救被洪水冲走的电线杆子而牺牲。此后才有向金训华学习的事。1966 年绝不可能有向金训华学习的口号。这张大会入场券显然是低劣的赝品。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 1966 年 11 月，不仅没有“中共中央文化部”这样一个单位存在，而且，直属国务院的文化部，也已经成为当时首都造反派要砸烂的所谓“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这“三旧”之一（首都文化界的造反派有一部分就名为“砸三旧”派）。因此，造假者连这点起码的历史常识都没有，居然就敢于打出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共中央文化部”的名字来假造文物，实在是可笑之至。而那个主持人“于会游”的名字，也显然是造假者只知道文革中有个文化部长于会泳，将“游泳”二字记混，把名字错写成了于会游。但造假者却不知道于会泳是在 1975 年 1 月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上才被任命为部长的。

还有一个以所谓“中共中央革委会”名义发出的《革命批判大会入场券》，卜伟华也论证了其荒谬之处。

另一个更明显造假的是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办”名义发出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各大院校革命师生第二次联合揪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万人大会入场券（专场）》，时间是“1967年4月19日上午八时整”，地点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院东大厅”。

卜伟华指出：“这张入场券是伪造的。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于1967年4月20日，怎么可能在它成立的前一天就以它的名义组织万人大会？”主办单位列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也是荒谬的，因该单位是内部办公机构，从不对外公开活动。开会地点也是问题，“既为‘东大厅’，又怎能开‘万人大会’？”

还有一处明显暴露其造假的证据卜伟华没有指出来，即大会名称中对刘少奇加上的“叛徒、内奸、工贼”这三个头衔。众所周知，给刘少奇定下这三大罪名，是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此之前，刘少奇有许多五花八门的罪名，诸如“中国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大叛徒”、“大野心家”、……但是没有谁会给刘少奇一次性戴上“叛徒、内奸、工贼”这样三顶帽子。谁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地在1967年4月就预先把一年多后中共中央才给刘少奇定下的三大罪名想到（或猜到）并实际使用起来。

在《证照中国》一书中，还有别的文革文物可疑。比如，其114页上展示的一张《红卫兵串联证》，发证单位是“井冈山红卫兵团”，这个名称就很可疑。因为在大串联时期，各地党政机关还在正常运转，许多学生都是凭学校或地方当局的介绍或证明或学生证外出串联的，即使是由学校红卫兵组织发出串联证明，当时也都会写明是哪个地方的哪个学校，而不会不写学校名称只含糊其辞地写个“井冈山红卫兵团”。这样的证件拿出去很可能当时就会被认定为假冒。更滑稽的是，此证前面印的“最高指示”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不但荒唐而且危险，因为在当时谁要把不是毛泽东的话说成是“最高指示”，就有可能被上纲为“伪造最高指示”，轻则会遭到激烈批判，重则会被扭送公安局。谁还敢拿着这样的证件到处去串联招摇？

由此，笔者想到了几年前在都江堰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商店看到的假造文革文

物，几个烧制着文革时期领袖人物彩色照片的陶瓷挂盘。其中一个一眼就能看出是假造的文物，它堂而皇之地烧制着“十大元帅”的头像，背面烧制的制作单位名称和时间是：“四川省革委/四川省军区/一九六八年”。我当即向商店老板指出这是假文物，老板先还不以为然，我就告诉他：在1968年，“十大元帅”中的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都因所谓“二月逆流”问题在接受批判，朱德也受到了批判。当时只有林彪是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全党全国全军的“副统帅”，他怎么可能与其他九位相提并论平起平坐？再说，背面那个制作单位名称把“四川省军区”与“四川省革委”并列，也是不对的。在1968年，与四川省革委并列的只是成都军区。当时无论召开会议还是发布文件，都是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联名（后来笔者查到从1971年开始才有了四川省革委与四川省军区联名行文的情况）。我这样一说，那老板才不得不承认那个挂盘是假造文物。当时我还没有说另外那几个烧制有毛泽东、林彪、江青像的陶瓷挂盘是假造文物。后来我想，实际上那几个在大小、颜色、款式等方面都与那个“十大元帅”挂盘一样的陶瓷挂盘（显然是在一个地方同时烧制的），应该也是假造的文革文物，因为在文革初期，尚未见到有挂盘这样的摆设工艺品流行。在1968年底到1969年初最狂热的“三忠于”活动中，也没有听说过烧制陶瓷挂盘，只有烧制陶瓷的毛主席像章之类。挂盘的流行是在多年以后了。

文物造假，是近年愈演愈烈的现象。有的假造文物甚至已经以极高价位流入国际市场。比起假造明清瓷器或古人字画来，假造文革文物那简直是太方便、太简易了。因此这就更值得人们注意。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

【小资料】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年1月27日成立）

主任——

刘建勋，55岁，河北沧县人，河南省革筹组组长、省军区第一政委

副主任——

王 新，49 岁，山东武城人，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
纪登奎，45 岁，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耿起昌，49 岁，原中共新乡地委第一书记
杨力勇，陆一军政委
常委——
张树芝，53 岁，湖南华容人，河南省军区司令员
陈桂昌，河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王 辉，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杜河堤，河南省军区副政委
李忠顺，河南省军区副政委
王洪智，空十三师师长
王庭栋，原中共河南省委委员
张 申，原中共开封地委第一书记
王维群，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
王黎之，原中共郑州市委第一书记
张耀东，原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张钦礼，原中共兰考县委副书记
戴苏理，49 岁，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郜国荣，原国家黄河水利委员会干部，“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轩东森，原河南省建工局干部，“河造总”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申茂功，28 岁，郑州国棉六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主任。中共
党员
杨锡淼，国防科委十三所技术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唐歧山，39 岁，郑州铁路机务北段工程师、司机长，郑州铁路局大联委主任，“二
七公社”负责人，中共党员
申红玉，开封电厂工人，开封“八二四”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郭守仁，开封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人，“八二四”负责人
龙一兵，郑州第二砂轮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李福山，郑州印染厂工人、省大联委委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唐振方，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豫西造反派负责人
张国劳，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豫西造反派负责人
张宗海，省建工局二处工人，“河造总”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吕书墨，新乡七里营党支部书记，省劳动模范
文香兰，女，34岁，鲁山老庄公社副社长，省劳动模范
党言川，24岁，郑州大学学生，“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学生，“八二四”负责人
杨国雄，河南医学院学生，“河医东方红”及“二七公社”负责人
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派“粮院联委”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范念民，河南农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派“豫农红总”（河南省农学院红卫兵总部）负责人
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新乡师院“八一八”负责人
丁素琴，女，河南中医学院学生，中医学院“八三一”及“河造总”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王传玉，郑大附中学生，“二七公社”郑大附中红旗公社负责人，郑州中学联委负责人

河南两派为“二七公社”和“河造总”（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开封“八二四”（八二四造反委员会）与“二七公社”同属一派。因中央明确支持“二七公社”，因此在省革委组成中“二七公社”派占绝对优势。

【编读往来】

一、陈益南来信指出，今年第十四期《黄永胜被列入“共和国开国元勋”名单》一文中，将粟裕误为上将，粟裕应为大将。

二、李晓航来信指出，今年第十四期《董健教授访谈》一文中的“鞍刚宪法”应为“鞍钢宪法”；《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一文中的“麦国主义”应为“卖国主义”。

谨向陈、李致谢，并向读者致歉。